



方 修

長夜集

洪天賜教授捐贈

長夜集

方修



* Ang Tian Se
Jabatan Pengajian Tionghoa
Universiti Malaya
Kuala Lumpur.

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地址：檳城海山街 100 號
電話：(04) 221 1111

總發行所：檳城海山街 100 號
電話：(04) 221 1111

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2002 年

封面設計：王春鑫



長夜集 方修

出版：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社址：341, Jalan Membina

Barat, Singapore 3.

承印：理想紙品印刷公司

日期： 3. 1973 再版

M \$ 14 0

目 錄

培养戏剧工作接班人	1
旅行	3
科学小说	5
中国通	7
“迎春会”	9
音乐与国界	11
地 皮	13
关于“黑魂”	15
谈“破纪录”	17
拖 尸	19
中间人	21
女评论员的迷惘	23
玉腿与智力	25
国际性的学潮	27
红帽子的妙用	30
“西欧式的民主”在那里?	32
穷人运动	34

日本大学的怪现象?	37
选美会的政治内幕	39
考试恐怖症	41
心脏移植座谈会	43
史学家的新玩艺	45
东南亚研究	48
喜癖士	55
汤恩比的“日本印象记”	58
“客观”报导的范例	63
汽车与轰炸机	65
“美国领导”	68
经理病	71
西德近闻	73
“感情”的照顾	76
美国骚乱调查报告书	79
瘟神? 财神?	81
逃兵及其他	83
电影杂谈	88
“独立思考”	99
今日苏联	103
周作人的回忆录	106
悼范文澜	117
河崎丢官	120
鲁迅纪念晚会	123

胡志明的汉诗	125
再谈苏联	127
史太林爱女的新书	130
关于乔冠华	132
真正的闹剧	134
遊行的型式	136
英王室喊穷	138
美莱村事件	141
“正义”的遗漏	147
富翁与战俘	150
后 记	153



培养戏剧工作接班人

报载，星加坡艺术剧场刻正大量招收新会员，并为他们设立“戏剧讲座”，“小说欣赏”，“读词训练”，“呼吸训练”，“排演实习”等研究班，旨在培养新血，使之成为戏剧工作的接班人。

培养接班人，确是目前本地艺术界的当务之急。不但戏剧工作有此需要，其他艺术部门也是同样情形。因为，老一辈的艺术工作者，落荒的落荒，後退的後退，早已显得人才凋零，急待大批新血起来补替了。

然而，培养接班人，却也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因为我们所谓接班人，不单是就艺术技巧来说，而且也是就思想素质来说。以戏剧言，则我们所需要的戏剧工作接班人，是要能够保持并发展马华戏剧工作的优良传统，把搞戏剧当作教育事业，坚持现实主义的道路，反对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道路；坚持演有意义的严肃的戏，反对演无聊的胡闹的戏。同时也要能够锲而不捨，安於戏剧工作者的艰苦生活；在戏剧运动的繁盛期，固然是积极的努力工作，在剧运走了下坡的时候，也仍然站稳岗位，惨淡经营。如果只有技巧，没有

理想，好戏也演，坏戏也演，甚至渐渐滑到严肃的戏剧工作的反面去，专门从事毒害观众的表演；或者搞了三两年戏剧，受了物质或“荣誉”的诱惑而跳槽到电视或电影场去，如近年某些国家的许多剧人的情况一样，那就不能称为戏剧工作的接班人，而是一般的影剧演员。所以，较严格说来，戏剧工作的接班人的培养，乃是一种思想素质的培养，而且要教学相长，使到新学员和老剧人一同进步起来。

（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旅 行

张清江君的《北欧记游》，有一段谈到亚籍旅客的情形。据丹麦的旅游协会报告，亚籍人每年到北欧观光的，以日本人佔绝大多数，华人少之又少。日本人特别喜欢旅行，如果能力办不到，不能出国，也要设法在国内游玩的。

其实，华人也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民族。孔子的週遊列国，也许可说一半是职业性的，但太史公的遍遊名山大川，李太白的纵情山水，“抚剑独遊行”，以至徐霞客顾祖禹辈的漫遊四方，寻幽探胜，却就完全是兴趣所驱使了。

一向与旅行没有什么缘份的，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一种是生活在紧张的战斗里的猛士，前者无钱，後者无暇。他们有时虽也会有离家远飏的，但那是流亡或逃亡，不是旅行。然而这些人也祇是没有机会旅行而已，并非不喜欢旅行。例如鲁迅，他自己很少有遊山玩水的馀暇，却也鼓励别人浪遊为快：“何似举家遊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近年来，华人赴各地旅行的确是比日本人少了。这恐怕是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中国方面，可不必说了，反正“五

嶽归来不看山”，万里锦绣，尽够七亿人民遊目骋怀的。印尼缅甸等地的华人，也不必说了，他们如果能够苟全生命於乱世，於願已足，那里还敢有兴趣去观赏什么花都艳舞，瑞士雪景？就单说星马地区吧，华人的出国旅行，似乎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前些时，同是“东盟”国家的菲律宾，不是还要友邦的华籍公民的旅客在入境签证上盖指模么？日本人倘也处在这样的一种境地，大概出门做客的也会少之又少了。

（六七年十二月四日）



科学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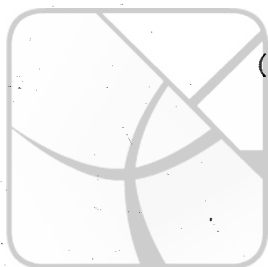
吉隆坡国家语文局本年六月间举行了一次科学小说创作比赛，参加者一〇九人，评选结果已於昨日公佈。入选佳作共十一篇，第一至第三奖的篇名为《密室中的怪物》，《金利扇》，《当尘土飞扬时》，据悉作者均为学校教师。

科学小说在小说创作中是比较後起的流派，大约出现於近代科学日渐昌明以後。因为科学知识的发展，大大地加强了人类對於征服自然的信心与幻想，於是产生了这类對於未来世界的预言性的描写。十八世纪末法国梅西的《纪元二四四〇年》，可能为其先河。其後科学发明日进，科学小说也就渐渐盛行，作者们都以他们的科学的想像来塑造各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到了威尔斯的《月球旅行》，几乎已达成熟的巅峰，奠定了科学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

然而，较严格地说，科学小说毕竟不是小说创作的正轨。它们有些是科学价值高於文学价值，有些是像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一样，娱乐性多於艺术性。正规的小说创作，一定是描写人生，描写交织着人生的各个方面，包括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类社会的演变，人生意义的追求等等，从而提

高读者的生活知识，以及思想，道德，美学的修养，并通过对于读者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来改进社会，科学小说是缺乏这种功能的。真正优秀的科学小说家也都会认识到这一点。威尔斯对于科学小说创作的浅尝辄止，而将彩笔从虚渺的太空转回到现实世界来，写出了好些更有价值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威尔斯的道路不妨就是当地的科学小说家的道路。我们要有优秀的科学小说，也要有更多的描绘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的小说。



(六七年十二月廿一日)

中国通

报载，澳洲国立大学的两名学者，刻正积极地编纂莫理逊氏的档件。莫理逊为澳洲人，生前久居中国，熟悉中国民情风俗，官场故实，为现代中国史的权威，西洋人心目中的中国通。氏於一九二〇年逝世，遗下日记、书信、备忘录等文件凡六百万言，现珍藏於悉尼的米则尔图书馆，可以整理成六至八巨册的专书。

近百年来，外国人士致力於研究远东各地的历史文化，甚至长期旅居於一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作深入的探掘考察，而终於成了某一方面问题的权威，被誉为“中国通”或“南洋通”之类，为数颇众。對於这些权威，西洋人一向是珍如拱璧，啧啧称赏。然而，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心目中，所谓中国通或南洋通，却就不一定是那么光彩的瑰宝。他们之中，有真正爱好亚洲古国文物教化的热心人，願以毕生精力来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甚至为了维护真理正义而进一步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站在一起，献身於反侵略的伟大事业；也有不高尚的文化商贩，专门收买古董字画或偷运敦煌的藏经；有职业的著作家，目的在蒐集资料，写

些遊记，如《亚洲内幕》、《中国暴风雨》等等；也有职业的活动家，以探险、考古、行医、传教、讲学、或担任什么顾问之类做幌子而干其“为王前驱”的勾当，如战前日本的大批“南洋通”，他们的所谓学术研究，很多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东南亚侵略的一种舖路工作。同样是学者权威，其情况的複杂，形形式式，有如是者。

悉尼图书馆严禁澳洲居民研究莫理逊氏的档件，也许有他们的理由，但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我们要学习分辨这种複杂的情况，对各种各样的南洋通或中国通，给予个别的不同的适当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的面目，既不粗暴的抹煞，也不一味崇拜权威，把杂草当香花。这是当地学者的一项新的工作。

(六七年十二月廿八日)

“迎春会”

报章上近日刊出了一帧照片，内容是一批美国的“喜痞士”在旧金山金门公园举行无遮大会；数十名青年男女赤身露体，堆在公园里庆祝春回大地，名目叫做“迎春会”，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围观。这真是世纪末精神流行病患者的一幅划时代的杰作。

世纪末精神病的流行，迄今已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社会的矛盾，个人的没有出路，加以旧道德的崩溃，新道德的无法建立，生活失去了目标，行为找不到准则，造成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悲观绝望，然而却又还有一点精力需要发洩，这就免不了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这些病态的发展，初期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其一是从事於超脱现实的艺术创作，希望挽着自己的头髮而离开地球。於是有了颓废主义，唯美主义，象徵主义等等艺术家。那些曲高和寡的现代诗，以及什么印象派感觉派的绘画，就是由此而来的。另一个倾向是沉缅於享乐主义的色情生活，尽量找寻官能的刺激。因此又有了脱衣舞，变相舞廳，黄色杂志，暴露性电影，披头四的歌斯底里的狂叫，以至於什么迷幻药等等应运而生，来满足这

一方面的需求。

然而，日子一久，这些玩意儿也就显得不够新鲜，不够刺激，非有更加奇特的发明，不足以振奋那些病患者的日益麻痹僵化的神经。於是，喜痞士来了，他们的无遮大会，把“艺术创作”与色情生活凝合为一，形成了世纪末精神流行病的一个飞跃的进展。你看他们男男女女，纷纷把最原始的艺术品展示於春光明媚的公园中，不是比较在黑暗的小天地里狂欢达旦更加有趣，比较他们的艺术家提起笔来塗塗抹抹，玩弄玄虚又更加省力，更有观众么？



(六八年三月廿九日)

音乐与国界

一位叫做鲁威的德国音乐家，上週到吉隆坡来作电子乐器的表演和钢琴独奏。他发表谈话说：什么都可以讲国界，只有音乐绝对不能分彼此；譬如食物，你可以说这是什么国家的物品，但音乐却就没有这种界限。

音乐真的没有国界吗？我想这倒不能一概而论。太古时候的音乐，大概是没有国界的。它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时的产物，人类用音乐来表达劳作时的思想感情，或者调节集体工作时的动律，或者增进劳动的效率，或者庆祝他们的丰收。功用儘管多种多样，但主要的目的总是在对於自然的抗争，击退自然的迫害。那时候，岂但音乐没有国界，整个地球也还未有国界存在呢！

然而，到了地球上出现了国界之後，音乐就与生产活动渐渐脱离了直接的决定的关係，而开始与国界发生纠葛了。这时，音乐常常被利用为一种宣传与教育的工具，或者鼓舞士兵去从事侵略的不义战争，或者激励群众去进行反侵略的正义鬥争，或者用以麻痹某一民族，某一群体的神经，消除其鬥志。这么一来，本来没有国界的音乐，由於使用者国界

分明，也就被打上了国界的印记。时代愈近，音乐的国界性就愈明显。甚至出现了所谓“禁歌”，不同国家的音乐彼此不准交流演唱。二次大战後期，星马淪陷，日本军人不就严禁当地人民唱抗日歌曲，而代之以什么《苏州河之夜》那种靡靡之音么？相信当时德国法西斯份子在其佔领区，也是实施类似的文化政策吧？

（六八年四月七日）



地 皮

报载香港拍卖行最近拍卖楼宇与地产，竟然出现了买客寥落，无人叫达底价，以致终於拍卖不成的怪现象。据说这现象极为罕见，乃反映出香港商人对于该地房地产业的完全失去信心。

香港商人对于房地产业的信心大大动摇，显然是由於前些时港九的骚乱局势所引致的。然而一般人对香港未来命运将如何安排，摸不清楚，心存观望，似乎更是造成这种怪现象的主要原因。香港人过去盛行着一种论调，断言中国为了对外贸易的需要，绝对不会收回香港。这调论近来突然消沉了下去，说明了大家的看法已经因时而异，有了保留，再也不敢那么肯定了。

一位已故的美国作家，生前曾力劝他的後辈尽量搜购地皮，理由是：“上帝造人，却没有加造地皮。”这话一向被很多人奉为至理名言，自然更是地皮炒家的座右铭。真的，人类一天天增加，地皮却始终是那么大小，价钱那得不大涨特涨呢？可是，现在看来，这话却也不见得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了。香港房地产价格的一落千丈，就是

一个最好的反证。何况现代科学日新月异，已经赋给人类以移山倒海的本领，如什么“与海争地”，“填海为地”之类。更何况一些国家又有了分田分地的新制度。房地产既然可由众人来随意分享，则地皮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垄断居奇了。

看来上帝虽然没有为人类加造地皮，人类却是能够为自己创造地皮的。

(六八年四月十四日)



關於“黑魂”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鲁特京本月四日被暗杀之後，引起了美国各大城市的空前种族大暴动。虽然当局出动了五六万名军警，終於镇压了下去，但一般论者都认为这并不是暴乱的结束，而是黑白大混战的开始。原来美国的黑人组织十分複杂，除了真正左翼的秘密组织外，思想主张互不相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团体还有好几个，基本上分为激进与温和两派。鲁特京算是温和派的代表人物。鲁氏的遇害，等於宣佈了温和派的理想的幻灭，促使更多的黑人群众跑向卡迈克尔所领导的激进派的“暴力革命”的道路。

黑人问题一向是美国国内的一大矛盾，近年来却被美国干预越战这个更大的问题掩盖住，许多人的视线给越战的不断升级以至约翰逊退出竞选总统之类表演吸引去了，對於黑人运动的情况反而疏於关注。或者只是知道美国黑人问题的严重性，不大了解他们的组织的複杂性，因而對於某些有关的问题也就感到十分隔膜。这次由於鲁特京事件的发生，有关的新闻报导增加了，这才使到一般人對於这方面的情况，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我个人首先弄清楚的一件事是关于去年曾在星马演出的话剧《黑魂》的问题。这剧本所突出的是黑人对于住屋，医药，卫生，以及传统的操守等等的要求，似乎不能怎样算是反映美国黑人问题的代表作。然而据说却是受到黑人的热烈支持，由黑人自己集资在各地演出。尤其奇怪的是白人也广泛地爱好这作品。它是纽约百老汇第一次上演的黑人剧本，又获得美国许多报章的一致推崇讚美，而且拍成了电影，更得到什么特别剧本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确是令人莫名其妙的。现在我们既然知道黑人运动竟有所谓温和派和激进派的不同，则这些疑问就易于解答了。不过这剧本在美国的经常上演，怕也要随着鲁特京的遇害而收场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廿一日)

谈“破纪录”

里约热内卢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因为吞下了卅八粒石弹子而嚷肚痛，被邻人送入了医院。据说此子早已养成了吞石弹子的习惯，这一次为了与人打赌，吞得太多，终於吃不消了。这和不久前的一则电讯，说是有一个家伙，为了打破自己的纪录，藏身地窖三四十日不肯出来，引致太太要求离婚，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人类的确常常有些打破纪录的壮举，而且为了打破纪录，也常常展开剧烈的竞争。这是根源於人类的一种征服自然、改善生活的思想愿望。“人”之所以能够变成“巨人”，作为大自然的主宰者，就是不断地克服困难，战胜自然的结果。然而人类永远不满足於已有的成就，所以即使早已晋入了“文明社会”，能够呼风唤雨，为了澈底的显示他们是万物之灵，进一步创造纪录，也仍然不断地以血肉之躯去向大自然挑战。於是乎爬山，航海，探险，奔月，不时有着新的成绩报告出来。可是，忘记了人类所以要创造纪录的真正意义，以为创造纪录的目的祇是在出人头地者，倒也大不乏人。因此这些人便变成了为破纪录而破纪录的庸俗的英雄主义者，

专门钻牛角尖，找些离奇古怪，而又比较省力的花样来搞。於是乎钻地窖，吞石弹子等等把戏就出现了。

然而，同样是打破纪录，同样是“出人头地”，其间却有崇高与卑下，优美与醜恶的大分别。当我们听到有人攀登上喜马拉雅的巅峰，或驾驶了火箭奔向月球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是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而当我们知道了有人在钻地窖，吞石弹子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却是无聊与作呕。这情形倒是值得说出来给一些专门企图打破纪录的人做参考的。



(六八年四月廿八日)

拖 尸

假期过去了，新的学年开始，各大专院校又出现了一系列“拖屍”的把戏。这种把戏今年似乎闹得愈兇，据说联合邦土著学院的一名女生，就被凌虐至引起精神分裂症，进了医院。於是各方面對於“拖屍”的指责也显得比往年更加严厉，连某些院校当局也表示要进行全面调查了。

凡在不合理的社会生活过来，饱受过侮辱与损害的人，当他们挣脱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可以反过来侮辱与损害别人的时候，就常常因为思想情操的高下不同而分成了两类人物。一类是有感於自己的身世之痛而對於和自己的过去遭遇同一命运的人加以同情与扶助，甚至於扩大了这种同情与扶助的范围而献身为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广大的人群谋求永恒的幸福。这类人的终局常常成为了伟大的不朽的社会鬥士。

另一类人，则与此相反。他们因为前此的曾受折磨而對於人类社会怀着一种狭隘的仇恨的心理，終於化为报复行动，把所有的积怨发洩到那些正处於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的人们的身上去，施以同样的或进一步的欺凌与虐待。其中最典型的是华人旧社会的一些童养媳，一旦做起婆婆来，就比她的

恶姑更显得兇狠。因而这类人也可称为“恶姑主义者”。现在的大专学生的玩弄“拖屍”，恐怕大多数也是基於这种恶姑主义的思想。然而恶姑主义者虽然享有了一点报复的快意，却是不会有什么大前途的。他们仇恨人类，人类也鄙弃了他们。

同情或仇恨，扶助或报复，一念之差，竟然促成了一个人的伟大或渺小，高尚或卑劣，这在社会上是屡见不鲜的。大专院校是社会的缩影，学生對於“拖屍”的恶习抱着怎样的态度，也可以预见到他们将来踏出校门之後的成就程度。



(六八年五月五日)

中间人

东南亚研究中心的专家依利斯顿在联邦农业销售局的出版物上发表了一篇大文，以“中间人在西马来西亚渔业上所负的任务”为题，指出中间人并非纯粹的剥削者，呼吁联邦政府客观地去调查他们在经济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位专家说：一般人都以为中间人并未进行任何有用的工作，只要发现一个商人插身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中间，就叫他做中间人，而不深一层去研究一下实际的情形。

按照笔者个人的理解，一宗商品——包括渔农业产品，一定要经过一番交换运动，才能取得比它的成本更高的价值，即所谓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创造并不完全归功于原始生产者，在商品的交换运动中，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譬如运输，售卖等；这也就需要很多工作人员，譬如载货司机，装卸工人，商店职员等。这些人为商品的交换付出了一份劳力（体力或脑力），也各各分割去了一份应得的剩余价值。这是他们的劳动代价，不算是剥削。（就现社会的情形说倒是受剥削的。）

中间人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可能也做了些有用的工作，

然而要确定他们是否是剥削者，并不能祇看他们的工作是否有用，而主要的应该看他们取得的代价是否适当的，应得的。如果他们也和前述的一系列的的工作人员一样，各尽所能，各取所值，那是非常合理的。但如果是取多给少，得到的东西大大超过他们的劳动价值，那就不能说是非剥削了。

当然，“纯粹”的剥削者可能是不存在的。纵使是最大规模的土库，代理商，九八行，以至运输公司，船务公司的老板，有时也会为了怎样使到“货如轮转”而动动脑筋的。然而，我们的“专家”，你不觉得他们所付出的和所取得的委实是太不相称么？



(六八年五月十二日)

女评论员的迷惘

日本的一位女评论员上坂夫人最近进行了一次关于“大学教授薪俸是否低微”的调查，结果不但调查不出什么，反而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学教授究竟是不是一种职业？如果是，他就不应该有兼职或利用他的研究成果的自由；如果不是，他就不应该斤斤计较待遇或申诉他的收入低微。上坂夫人下结论道：她越来越觉得这问题越复杂而不容易解答了。

这样的—个结论倒也并不奇怪。只要这位女评论员把职业与事业始终机械地分开来看待，她就永远要为这个问题感到迷惘。

现社会，职业与事业确也常常成为一种对立物，迫得一般人非加以分开对待不可。许多人几乎都因此养成了双重性格，把每天到工场或写字楼去出卖八小时以至十多小时的劳力，做他们自己所不乐意做的工作，以换取起码的糊口之资，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到了工余之暇，可以按照自己的旨趣来搞点学术研究或团体活动，才认为是真正的在做自己的事业。

然而，偶尔也还有少数人士，可以把职业和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必分得那样一清二楚的。譬如若干比较正直大学教

授，书刊编辑，专栏作家等，他们把讲课，研究，写作当作谋求温饱的职业，也当作促进人类文化的事业；既讲究工作的意义，也计较工作的待遇。这样一来，有人就不免要大驚小怪起来：你们既然有了兼职的自由，研究的自由，发表文章的自由，你们就不应该把工作当作职业而申诉待遇菲薄，否则，作为一个僱员，你们就不应该有太多的自由。

这话也许有点道理，不过恐怕只有三菱三井等财神爷会表示讚赏吧了。时代是进步的，将来的社会，必然是职业与事业适当地结合，工作的意义与待遇都被重视的社会。这样的一天终究是要到来的。

(六八年五月十九日)

玉腿与智力

一位英国研究专家报告说，他发现了女人的智力与其玉腿的外形“息息相关”，他准备拍摄一千对玉腿来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这个消息引起了一家美国报章的兴趣，竟然捷足先登，派记者到一间学院去摄取几名学业成绩优劣不同的女学生的玉腿，刊诸报端，要求读者参加判断，据说这叫做“科学试验”。

专家的理论及报章的科学试验，究竟认为玉腿的妍媸与智力的高下是成为正比呢还是反比，电讯都还没有报导，我们自然无由得知。但有一点却是极为明白的，就是不管他们的答案怎样，同样的理论都是早已有之的。如果说，玉腿好看者智力必定高超，那其实也就是所谓“优生学”的翻版。反之，如果认为玉腿愈丰满则智力愈差，可也同样不是什么新货色，生理学界早就有了一种论调，说是女人肥臀隆胸，脑筋就相对地迟钝；因为生理方面的内分泌过份发达了，心思方面就要减少几分透剔。

大凡不敢面对真理的研究专家，都有这么的一种情况：他们无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新发明，纯粹搬弄旧理论又怕大

家不赏识，于是只好把旧货色拿来改头换面，希望“化腐朽为神奇”，博得连串喝采声。实则孙悟空何尝能有一次翻出如来佛的掌心？过去的哲学界，有所谓唯我论，唯象论，唯生论，固然都是唯心论的易名；艺术界的所谓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终究也还是同样的一种东西：世纪末艺术。现在的玉腿学说，其远祖大祇是过去的一些优生学家之流，也是显而易见的。专家们也许知道，某一类学生学业好，某一类学生成绩差，都是有其长远的社会根源的，也正因为这样，现代有些国家的大学，索性取消入学考试，採用民间团体保送的办法；然而，研究工作一涉及社会问题，可就不太轻松了，还不如谈谈玉腿来得稳当而有趣。

(六八年五月廿六日)

国际性的学潮

欧美各国连月来普遍发生学潮，学生们展开一连串的示威遊行，要求改革大学校政，要求更大的个人自由，甚至於改变整个社会组织。就中以法国的情形最为严重，由巴黎拉丁区的大流血衝突发展到全国总罢工，威胁及戴高乐总统的政权。外国通讯社的记者在报导这一系列的事件时，喜欢採用“造反”字样，如“国际性的学生造反运动”，“全世界学生都在造反”等等；并认为这种“造反运动”是受到一九六六年夏间中国学生的“文化革命”运动的影响。

“文化革命”是一个震盪全球的新型的思想运动，它的带动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譬如“造反”之类字眼，便是“文化革命”兴起以後的流行词彙，就连各通讯社的记者，对於所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也似乎都耳熟能详了。然而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的发生，主要的原因还是内在的，不是外鍊的。国际性的学潮如其没有内在的根原，外来的刺激是起不了大作用的。反之，祇要学生造反有其必然性存在，则即使没有外界的影响，也迟早会以这一形式或那一形式出

现的。

什么是这一次国际性的学潮的根本原因呢，我想星洲日报驻英记者达人先生的报导是值得参考的，他说：在法国，“一九六一年的大学生是二十万人，现在是五十一万，增加了一倍半，但学校讲师课室设备没有增加，许多学生被格在课室以外，根本没有课可上。……最不能容忍的是，现代社会的目标是製造生产专家，为了大财阀大企业家生产更多更好的消费品，把教育制度也改组为供应生产专家的系统。现代青年反对做这个物质狂的社会的一轮一齿”。法国的情况是这样，其他地方的情况大概也差不了多少吧。

（六八年六月二日）

二

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提到博识家与专门家的谈话，认为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但专门家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而是悖在讲述他所专门以外的事。我们读了报章上的《傅吾康教授访问记》之後，也彷彿有着这样的一种感觉。

傅教授是知名的汉学家，尤其专於中国历史的研究。所以在谈论有关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历史问题时，自有许多独到之见。譬如他指出西藏自满清时代就是中国的一部份领土，并有军队驻紮；指出从太平天国到一九四九年的中国政治的演变，乃是西方国家的衝击以及西方国家联同日本军阀扩张势力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挑战所激起的一脉相承的政治社会变革的过程。这些都可以见出他确是熟谙中国历史的。

然而一接触到他的研究范围以外的事物，有时却就不免显出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的现象来。

例如，在谈到目前欧洲各国普遍发生的学生运动时，傅氏一方面认为目前欧洲各国的大学制度基本上是承袭十九世纪的旧制，不能配合时间的进展，适应现时的要求，而且由於学生人数大量增加，师生间的联繫已不复存在，因而对於现状产生不满，要求改革，这并不是件坏事。但另一方面又说有一些政治野心家“利用学生的不满情绪以遂私人目的”。这和三十年代前後的一些学者，在谈到中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时候，常常要加上一两句“有人在利用学生为工具呀”之类的话，以表示他们的见识高人一等，情形倒有些儿相似。

近日墨西哥的学潮空前猛烈，由於官警的残酷镇压，学生们伤的伤，死的死。如果有人根据这种“利用论”来演繹，也许不久就会出现一种论调，说是许多学生被人牵着鼻子走，活该被射杀的。

(六八年九月卅日)

红帽子的妙用

美国参议员罗柏肯尼迪本月初在参加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遭狙击毙命。噩耗传出，举世震驚。各国报章对于这件事情的评论，观点是多种多样。有的说这是腐败的美国社会的具体表现，有的说这是美国政府没有立法禁止携带枪械的错误；有人认为这和最近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鲁特京的遇害是同一性质，也有人指出这是由於罗柏肯尼迪近来常常抨击越战升级以及美国外交路线的更具有侵略性，因而引起好战的极端份子的憎恨所致。

尽管这些说法互有不同，但有一点是颇为接近的：一般上都认为这是一个有关美国内政的问题，是极端份子杀害异己的政治阴谋。祇有一种论调别开生面，那就是洛杉矶市长约迪氏的所谓“凶手乃受共党的影响而行刺肯尼迪”。据说证据是凶手塞汉在他的日记中自称同情外国共党云云。

红帽子竟有这么无穷的妙用，实在是足使人驚异的。以前我们祇知道它可以用来製造事件，诬陷无辜，或箝制輿论，打倒政敌，或对付好像卓别龄一类不为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欢迎的人物；却没有想到它还可以用来大事化小，小

事化无，把复杂的内政事件简化为空空洞洞，不着边际的所谓外国共党的影响。如果这论调能够成立，那么约翰逊总统新近所委任的凶杀案调查委员会，就要比调查一九六三年约翰肯尼迪遇害案件的华伦委员会，更加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了。难怪连加利福尼亚州的总检察长林治，也要对约迪氏的谈话大表不满的。

(六八年六月十六日)



“西欧式的民主”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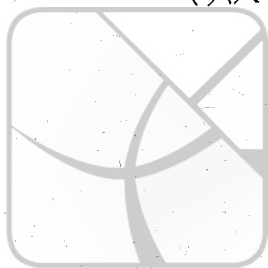
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纽约州长洛克菲勒，近日在四十家报章上同时刊登广告，为他的竞选作宣传，指责美国对越南的政策错误百出，“因为它是要保卫西欧式的民主，而越南人却不知民主是什么意思”。

越战政策近来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竞选宣传的热门论题，问鼎白宫的财主们又有的的是钱，多登几版广告来攻击华盛顿的现行措施，本来不算是新闻，奇怪的是这位先生居然还闭着眼睛在侈谈民主，似乎忘记了他的週围实际上正是一个残暴，恐怖，血腥的世界，连最温和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最无足轻重的总统候选人，也一个个被干掉了；现在除了战争贩子的疯狂叫嚣，携械凶徒的横行无忌之外，那里有什么民主可给越南人来欣赏？

大家都知道，美国不但从来就没有民主，也未曾有过所谓“西欧式的民主”。星洲日报的通讯版日前登过一篇美国记者的巴黎通讯——《法国式的民主》，报导他在巴黎所见的街头巷尾的政治性辩论，其中有这么的一段：“一位法国报人反问道：美国人是否能够号召数百万群众，在纽约，

芝加哥，或洛杉矶的街道遊行，而在数里的行程中高声呼喊，以維護他们的政治信仰？美国人是否能够分成两派，同时展开反政府与亲政府的遊行示威，而不致演成流血事件？”这一问，连那位美国记者听了也哑口无言，祇好默认。可见，如果要谈论所谓西欧式的民主，还应该让那些被称为“巴黎公社的好儿女”的法国人去誇口，山姆大叔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发言的资格的。

(六八年六月廿三日)



前
象
拿
东
一
抬
股
同

被
匪
屈
自
枯
人
去

一
作
大
主

穷人运动

金元王国国内的种种矛盾的暴露似乎层出不穷，继着一连串的工潮，学潮，黑人民权运动，以及政治暗杀案之后，现在又有了穷人运动以至骚乱事件的发生。穷人运动本来是以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非暴力方式进行的，他们要求政府加速供给美国三千万穷人以教育，食物，医药，与住屋。然而由于华盛顿警方关闭了他们的总部所在地的营棚——穷人觉醒城，并大举逮捕穷人领袖，乃酿成了上週二的一场大骚动。

有些人一向喜欢替美国粉饰昇平，掩盖贫富阶层的尖锐对立。诸如说美国人的生活享受怎样美好，即使穷人也抵得过其他国度的小康之家。不久以前，我们就看过这样的一篇报导，说美国穷人如何与众不同，他们有时也会趁火打劫，但搬走的东西却不是米粮食物而是电视机之类奢侈品，可见他们是完全不愁衣食的。然而事实终于证明，美国穷人并没有福气悠哉游哉坐在家里观赏电视，他们需要牛油麵包较之其他国家的穷人更加迫切，失业饥饿把他们推上生活斗争的

前线，不惜以血肉之躯去抵当警棍与催泪弹的袭击。

其实，趁火打劫的人，不搬走粮食而看好电视机，这现象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商业社会里头，一切都商品化，可以拿来互相交换的。电视机卖了钱，同样可以变为麵包。抢搬东西的人目的在捡便宜，自然是选择最轻松又最值钱者下手。一架电视机如果比一包麵粉值钱，而重量相同，那就会先被抬走了。然而搬走电视机可不一定是为了欣赏电视；正如一般偷车贼把汽车偷走，并不一定为了要去载女朋友兜风，是同样的道理。

(六八年六月卅日)

二

美国穷人运动事件於穷人觉醒城被拆除，领袖阿伯纳迪被判坐监之後，算是告一段落；一星期来除了华盛顿国会週围的一场“沉默而尊严的遊行”外，可说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倒是联邦政府的围捕骡车队，防止虐待骡子，引起穷人的大发牢骚，成了一个有趣的插曲。阿伯纳迪牧师的副手扬格牧师指责美国当局照顾骡子的幸福尤甚於照顾三千万名穷人。因为“他们更关心那些可怜的骡子，可是对国家的穷人却一言不发”。

人的待遇是否需要和动物比较，这问题在二十多年前的上海文壇上就曾发生过一场小论争。有人指责租界当局禁止倒提鸡鸭，一方面却虐待人类，至於比不上动物。但鲁迅却不以为然，认为人能组织，能反抗；有力量，有本领；能为奴，也能为主，无需要比拟动物，要求西洋慈善家给予优待。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倒提》，后来就收在《花边文学》一书中。美国的穷人领袖如果能有机会读它一遍，大概就不会为了骡子的幸福比穷人更受关心而大鸣不平了。

人类的思想认识的进展，常常是参差不齐的。一个真理的发现，一个问题的解决，在某些地方早已成为过去了，可能在另一些地方却仍然在摸索中。世界有些国家的人民特别重视他们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历代大思想家的智慧的结晶，或者特别注重文化交流的工作，以便多汲取别人的一些新思想，新经验，那是很有道理的。



(六八年七月八日)

日本大学的怪现象？

星洲日报的通讯版登载过一篇东京通讯，报导日本大学的“怪现象”。据说日本的大学生逐年急剧增加，以致国立及县市立各大学都不得不超额招生。私立大学学生人数的增加尤其惊人；全日本的高等教育，几乎百份之七十以上都靠私立大学来承担。其中一间私立学府——日本大学，学生总数竟达六万多名，每年入学和毕业的学生，都以万计。这种情形自然会影响到大学教育内容的低落，教授讲课必须使用麦克风，学生则连与教授谈话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方面，由於学生人数的激增，又促成了学潮的猛烈，学生们经常以全校罢课的手段来反对提高学费或其他校政措施。

这篇通讯还没有谈到日本大学生的出路问题。如果它再告诉大家说日本大学生的就业薪给，一般上只有百多二百元星马币，我想大概会有很多人要问：干吗要办这么多的大学呢？只办一两间第一流的大学，製造少数领高薪的特权份子，则学生出路既有保障，又不必担心教育内容低落或动辄发生学潮，那不是更加写意与安稳么？

然而，这也许正是日本这个国家的一个特色。日本曾经

长时期成为亚洲的最先进的国家，不但科学工业居於领袖的地位，为国家赚了不少的财富；就是文艺学术方面，也成了许多邻邦学习摹傲的对象，吸引了不少好学青年前往“镀银”。这些都无非因为东洋人的高等教育发达，文化水平高，人才多，在发明或发现上有其过人之处的缘故。现在，日本称雄亚洲的时代虽已过去，却也还有很多足以誇耀的地方。譬如，当你听到泰国国家发展部长乃朴的报告，说全泰国的报纸每日仅销得二十万份的时候，你会自然地想到日本报业，单单一家朝日新闻，每日就有了四百万份的销数。

你願意让人家称为文化的沙漠，还是宁願让人家多谈一些大学怪现象呢？这恐怕是见智见仁，很难一致的吧！

(六八年七月十四日)

选美会的政治内幕

香港英文虎报上週一著论批评美国迈阿密滩的“环球小姐”选美会，认为一向来都具有“政治内幕”，中选者所代表的国家，正是美国所要拉拢的国家。该报举出几个例证来说明这个一年一度的赛美盛会如何和政治发生联系：当美国的醜恶形象在印度遭受唾弃之时，於是印度小姐中选了；当泰国人反对泰国的美军基地时，於是泰国小姐中选了，泰人反美情绪很快就宁静下来了；美国约翰逊总统最近才到巴西去作争取友谊的访问，如今巴西小姐又荣膺美后，这难道是巧合吗？

如果这家英文报章的批评是正确的，那么历届的许多世界美后，都应该同声一哭了。原来她们的当选世姐，并非真的是天香国色，艳冠全球，而是政治行情的涨落使然。那些一致讚美她们的三围尺寸的评选员，也并非真的是顾曲的周郎，相马的伯乐一类大行家，而只是一堆树胶印章，在等因奉此行事吧了。对于自以为是纯憑天生丽质，压倒群芳的美后们，恐怕没有比这个更可伤心的事了。

然而，即使世姐的竞选确有所谓“政治内幕”，那也不

算什么咄咄怪事。实际上，目前的很多遴选或选拔什么的，几乎都无不受到政治因素所左右。不过有些做得比较隐晦，不易觉察，有些则属粗线条作风，显而易见；或者有时表现得公正堂皇，不偏不倚，有时却不免要露出一点儿痕迹来而已。而且所谓政治因素，也不一定是由于要平息什么“反美情绪”或掩饰什么“醜恶形象”，而是多种多样，形形色色，非常微妙的。譬如，诺贝尔文学奖金当局，对于苏联的许多小说都不感兴趣，偏偏看中一部《齐伐哥医生》，这是一种花样；《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萧霍洛夫，不迟不早，偏偏在中苏发生论争前後，他的《一个人的遭遇》等战争小说开始受到批评的时候被宣佈得奖，却似乎又是另一种花样。诸如此类，都是很耐人寻味的。

（六八年七月廿一日）

考试恐怖症

据说，日本最近发现了一种新的流行病，叫做“考试恐怖症”。患者以面临初中毕业试及大学升学试的学生居多，病象是突然手足冰冻，知觉麻木，甚且全身出汗，肚腹疼痛并下痢等。这是由于功课繁重，日夜准备应考，精神紧张，心理畏惧，神经系统发生变异所致。

实则这一类的病症，并非日本所独有，在其他的许多地方也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不但流行於初高中毕业试学生的圈内，也同样发生於一般大专学生之间。每逢大考前夕，如果到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宿舍参观一下，你就不难见到形形色色的怪现象，诸如学生在大开夜车准备功课的时候突发狂语，拍桌子，或者呕吐，昏厥等等。要谈“考试恐怖症”，这当然也是一种。

这类流行症之所以产生，功课繁重是一个原因，考试制度不善也是一个原因，但根本的癥结还是在整个的社会制度。现社会的财富，大都集中到少数大财团的手里，在大鱼吃小鱼的剧烈的争夺中，不但“白手成家”的奇迹再也不会发生，就是想返回自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做个无怀葛天之民

也不可能了。一般人不是到工厂或大农场去出卖廉价的劳力，就只有到高等学校去领取一纸文憑，让公私机构来“量才录用”，谋求一官半职。然而劳力见贱，造成人们喜逸恶劳；文憑有价，偏又僧多粥少。於是考试遂成为了一个“去芜存菁”的筛子，初中筛掉了一大批，高中又筛掉了一大批，被筛掉了的仍然要流向廉价劳力的拍卖场去，只剩下一小撮幸运儿在等待领取高等文憑。如果是英联邦国家，这时又有了什么一等，二等，三等荣誉学位的竞争，那又要担心牺牲在这个“荣誉”的筛子底下了。考试既然与学生有这么密切的关系，简直就是他们的一生命运之所系，除非他们具有更远大的目光，更高级的理想，否则怎能不发生“考试恐怖症”呢？

(六八年七月廿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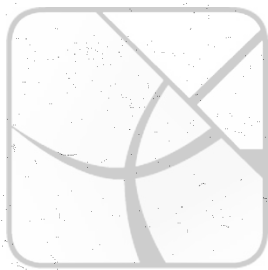
心脏移植座谈会

半个月以前，开普敦举行了一个国际心脏移植座谈会。医学家一致同意，目前尚无证据足以证明人类身体将不能忍受心脏移植与肾脏移植；人类体内发生排斥新心脏的事件可说少之又少，纵有这种现象也是可以用治疗来纠正的。然而事实似乎专在跟医学界捣蛋，很多换心人竟然一个个地相继不治逝世。日昨电讯传来，英国方面又有一位换心病者在施行手术五十八小时后宣告死亡。这是世界第二十八位换心病者，这些病者目前仅有九人生存而已。

人类的科学发明与创造，现在差不多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一颗核子弹可以毁灭一个大城市，一张雷达银幕可以映出千里外来袭的敌机，一枚长程火箭可以把太空人送上月球，这总不能不算是极尽旋转乾坤的能事了。那么，科学家要替一个病人换个心脏，照说应该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可是事实上却又不然，科学界尽管在征服太空方面显得威风十足，而在医药治疗方面的表现，倒还是十份低能的；换心换肾，始终没有发射火箭那么顺利。

这种现象说明了，人毕竟是上帝的最了不起的傑作，人

的生理构造比较任何庞大的科学工程都要复杂、精微、细致得多，人体上的任何一部份组织都不是轻易地可由科学创造来代替的。换心换肾的手术进行不顺利，倒不一定是科学家们不够高明，而是他们工作的对象是一批活生生的、变化万千的人，不是死的，静止的，被动的机械工程，不像声光化电的特点那么易于掌握。这也说明了，人终究还是世界上无比贵重的东西，人的价值始终是凌驾於一切物质之上；那些恣意作践人，不把人当人，以摧残人命为业绩的坏蛋，正是上帝的十恶不赦的大罪人。



(六八年八月五日)

史学家的新玩艺

—

亚洲史学家大会近日在吉隆坡举行，有位亚洲问题专家——伦敦大学的东方及非洲学院研究员波尼罗，向大会提出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出生的华人，是东南亚的精力充沛及成功的商人。他们到了东南亚，胼手胝足，终于很多人白手成家，当起百万富翁来。

这位专家的话似乎有加以补充的必要。那些到东南亚来的中国出生的华人，“精力充沛”可能是事实，成为“成功的商人”却是未必。原来早年由中国南来的华人，几乎尽属劳工移民；他们大多数是在中国失去了土地的庄稼汉，或是流落江湖的亡命者，既非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也非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自然可以说是精力充沛的。这些人在胼手胝足，参加东南亚地区的开拓的艰辛历程中，偶或有一小部份，得到特别机缘，白手成家，做个百万富翁；但千百倍于这个数目的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不是成为了荒烟蛮瘴里的累累白骨，就是在替人家开闢了无数的胶园矿山，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之后，仍然处于被榨取者的行列，挣扎于饥饿线上；甚

至於被诬为不爱国者，百般排斥，弄得颠沛流离，无家可归。譬如目前的苏门答腊北部，就有七八千名华人，被关在七个集中营内，连印尼的检察长苏义阿托少将也承认他们的处境“并不怎样好”。

至於少数微幸而成了百万富翁的商人，比起那操纵着本地区八十巴仙的经济生活的外国资本集团来，也还是小巫见大巫，无足轻重的。不过站在这位英国学者的立场来说，这一方面的情况自是不提为妙。

(六八年八月十二日)

二

最近在吉隆坡举行的亚洲历史学家大会似乎提出了不少“新鲜”的论题。什么拿破崙当年曾否煽动中国进攻俄国，什么一个华人到菲律宾去当劳工，三个月後就发达起来等等，都有人谈得津津有味。据说大会还讨论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专家们把这个称做争取亚洲民心的“文化运动”。来自菲律宾，印度，和美国的史学家大部份同意，这个运动在推行时所犯下的主要错误是日本人對於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没有充份的了解，日本是以亚洲强国的姿态进行其宣传，向那些许久以来受西方殖民地统治的亚洲人民强迫实施其“日本化”政策。

我们普通人的看法和专家们往往有点不同。我们认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并非什么文化运动，日本也没有把它当做文化运动，企图由此争民心；而祇是在师出无名之下勉强推出来的一个口实，用以镇压反抗侵略的亚洲人民。这种宣

传的必然失败早在日本当局的意料之中，因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规定了它的终局命运。

日本当年对内采取公开的暴力专政形态，压制一切进步活动，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对外则展开疯狂的军事掠夺，弄得整个亚洲地区，民穷财尽，无以为生；加以“皇军”铁蹄所至，姦淫屠杀，无法无天，尤造成了极度的白色恐怖。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本来还安排了一点点民主形式，日本却连这个也取消掉了。所以“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目虽然好听，也丝毫掩盖不了这种血淋淋的现实，迷糊不了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广大亚洲人民的视线。这和日本的宣传方式以及对於某一民族的“了解”程度是完全无关的。

(六八年八月十七日)

东南亚研究

亚洲历史学家大会在吉隆坡一连举行五天後，已经宣告闭幕。该大会的一名发言人称，这次提呈的专题论文共有一一六份，其中八十巴仙以上涉及东南亚历史，显示了世人对于东南亚问题，已愈来愈感到兴趣。据马大历史系教授王赓武说，东南亚是一个政治脆弱的地区，它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关注，恐怕是由於那些大国势力撤退之後会造成此地区的政治真空。东南亚在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它一直被人视为冷战的战场。

我们认为世人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愈来愈感到兴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由於东南亚地区在国际上的地位愈来愈形重要。通常，一般人做研究工作，其选择的地域对象，大多是一些文化传统深厚，对世界文明具有重大影响，或者国力雄大，一举一动都足以左右国际政局的国家，诸如希腊，古罗马，现代的苏联，美国，战前的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等。一向来有许多所谓“苏联通”，“日本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东南亚地区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并非处于这样的一种地位，所以一般研究工作者对它都不大重视。只有少数有关的宗主国或怀有侵略野心的军国主义者，如英国，荷兰，日本等，对它具有浓厚的兴趣，经常鼓励它们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为的是可以藉此多了解一点东南亚地区的情况，以便巩固殖民统治或帮助其军事侵略。然而，战后以来，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情势已大大不同，有些地方已经完成了民族解放的革命，有些地方情况的演变更牵连到整个的国际形势（如南越），这就使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地位突然显得重要起来，增加了世人对它的研究的兴趣。这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情形是相同的。

（六八年八月十九日）

二

亚洲历史学者的集会近来似乎特别频密。继最近在吉隆坡举行的亚洲历史学家大会之后，现在又有一个类似的会议在曼谷举行，报载超过十个亚洲国家的历史学者将前往讨论某些专题。

最近在吉隆坡举行的亚洲历史学家大会，据说所收到的专题论文八十巴仙以上是涉及东南亚区的，显示了世人对于东南亚问题愈来愈感到兴趣，我们曾认为这是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地位愈来愈形重要的缘故。其实这祇是就东南亚本身今昔的情势而言，如果拿来和其他某些地区比较，其重要性还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严格来说，一个亚洲的历史学家大会，东南亚问题独占八十巴仙以上，无论如何是不适当的。这恐怕和亚洲许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学者的研究环

境有关。

在世界的学术疆场上，有几个地区的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最热门的研究对象，譬如苏联，中国，欧洲等等。尽管东南亚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但总不及这些地区的动态对于国际政局那么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中苏论争，中国文化革命，捷克自由化这些事件一发生，就立即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日本的学术界甚至经常举行座谈会来讨论这一类问题。这是比较正常的现象。然而其他的许多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一般学者的研究环境都不如日本那么优越，那么能够自由地拥有各种各样的研究资料。这么一来，他们对于真正重要问题的研究既然无从着手，於是只好就地取材，偏向於本地问题的鑽研。这无形中等於把本地区的问题升上一大级，挤上了亚洲史学研究日程的前端。这也就是亚洲历史学家大会的论题八十巴仙以上是东南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六八年八月廿四日)

三

谈了三两次关于东南亚问题的研究，意犹未尽，这里再补充几句。

亚洲的历史学家大部份偏重於东南亚问题的研究，不论其原因是大家真的对于东南亚的历史愈来愈感兴趣，还是他们的研究环境的特殊使然，祇要专家们能够掌握到正确的研究方法，不至於堕入魔道，就总不能说是有什么坏事的。

东南亚历史的研究，一向存在着一个不大健康的倾向，

就是窄小烦琐，尽量避开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因而所做的经常是些考证工作，譬如单马锡考，大伯公考，某某甲必丹考；或者是些比较细碎的事象的介绍，譬如某国设立领馆的历史，某某码头建筑史，洪门会的组织内幕等等。在这样的一种研究风气之下，布都查理在监狱里写了一本关于星马的外国经济势力统计的书，竟然一鸣惊人，倒也没有什么奇怪了。

就最近的情形看来，东南亚史的研究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亚洲或东南亚的本位主义。专家们似乎认为西洋人的掠夺殖民地，统治亚洲人，坏事做尽，固然不易翻案；但如果是亚洲人侵略亚洲国家，奴役亚洲人，那就可以刮目相看了。例如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比西方的殖民主义更野蛮更落后的法西斯的血腥统治，这对于一般历史学者来说应该是一种最基本的常识；不料现在才事隔廿余年，就有许多人对它大大地感到兴趣。他们不是谴责它的大开历史的倒车或者以暴易暴，而是以惋惜的心理在讨论它的失败的原因。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現象吧？

(六八年八月廿六日)

四

因为谈论东南亚问题的研究，偶尔想起上月底在伦敦出版的一部关于远东方面贩卖妇女及童奴为娼的新书——《黄种奴隶的贩卖》。作者是爱尔兰的记者奥卡拉汉。据说他曾经踏遍东方的娼寮，从事搜集资料，不仅到过所谓按摩院和

舞厅，而且也调查了操纵这些行业的幕後人物，包括黑社会头子，贪官污吏等等。书的内容分为《妹仔（小婢女）——香港的童奴》，《香港——远东醜业的交换站》，《澳门——远东的污水渗井》；《台湾的套房女郎》，《东京的导游女郎》，《新加坡的男娼》，以及菲律宾，南越，泰国的醜业等章节，说明了作者调查范围的广泛。

这似乎也是一种东南亚研究，因为该书所涉及的，大部份正是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现象。唯一与传统的东南亚研究背道而驰之点是一般所谓正派的学者着重在史地问题的考证，这书则以醜恶的事物为调查对象。然而我们总不能说祇有史地的考证才是研究工作，卖淫业的调查就不成其为研究。而且，卖淫业在本地区也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溯流，考其演变，这也正和一些所谓东南亚史的专题论文一样，不失为一种学术著作。何况作者在这书中还探讨到某些地方的贪污活动，黑社会活动等等，比起一些烦琐细碎的考证，诸如三宝公有无鬍鬚之类论文来，也许倒是更有内容了。

然而，这样的一种东南亚研究，难道就是研究本地区问题的正确的道路么？那也不见得。它虽然摆脱了一般考证式的研究的烦琐之弊，却又走向了庸俗化与低级趣味化。按照该新书的章目看来，作者所做的显然不是在深入地发掘卖淫业的社会根源，而是在提供一些耸人听闻的所谓社会黑幕或带着黄色情调的调查报告。这也是东南亚研究的另一不健康的现象。

（六八年八月卅一日）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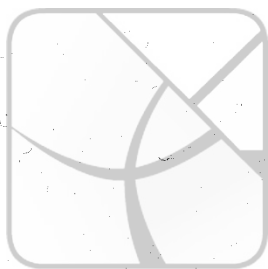
關於前些时在伦敦出版的那部《黄色奴隶的贩卖》的新书，这里还有点儿感想可以一谈。

从通讯社的报导看来，该书的著者奥卡拉汉其人似乎有点小聪明。他本来是在爱尔兰当兵的，结果却成了一个职业作家，写出了好几种有关各地卖淫及贩毒行业的著作，涉及的区域包括亚洲，中东，欧洲，南美各地，这部“黄色奴隶的贩卖”，祇是最新出的一种吧了。以一个丘八而终於在学术界打出了一片小天地来，不能不算是善於动脑筋的了。同时，此人似乎也很忠实於他的研究工作。他漫遊世界各地，冒着生命的危险以调查贩卖妇女及毒品的国际组织，以致经常接到国际黑社会人物的匿名警告信，但他还是始终坚持他的研究工作。这也不能不说是精神可嘉了。

然而，学术史上却也经常出现着这么一种现象：很多聪明而富有研究精神的学术工作者，由於他们所走的方向不健康，不正派，到头来终於受了时间的淘汰，而归於没没无闻。这里所指的不健康，不正派的方向，细碎烦琐的考证式的研究是一种，侧重所谓社会黑幕的低级趣味或黄色事物的调查报告也是一种。然而无论是那一种，基本上却是相同的货色，就是我们说过的，尽量避开一些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变成了可有可无，對於读者的真正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全无帮助。也许在新书出版的时候，有些人为了好奇心所驱使，会买一半本来翻翻，接着也就把它忘记了。金赛博士的许多關於性生活的调查报告是这样，现在的这一类什

么《黄色奴隶的贩卖》也将是这样。

(六八年九月二日)



喜癖士

吉隆坡讯，泰国近日实施新条例，凡是留“披头四”发型，穿“喜癖士”服装的颓废派人士，均不准进入该国。雪邦国际机场检查站，已接获有关通知。据泰国驻隆大使馆称，实施这项新条例，旨在防止不良份子进入泰国，以免影响泰国社会云。

与泰国的禁止“喜癖士”入境恰好相反，苏联的工会报纸劳动报，则在竭力歌颂“喜癖士”。据说，美国的喜癖士运动是真正有定轨的运动。“喜癖士”有更广阔的世界观，他们的头脑里不只有“狂热”，也有“华盛顿在越南的污秽战事”。他们不只客观地驳斥了当代都市文明，也“驳斥了统治资产阶级的政策——帝国主义对外的强盗政策”。

大家都知道，“喜癖士”并非像苏联所说的那么一回事，实际上祇是世纪末的颓废思潮的产物，是一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找不到出路，又不晓得应该怎样做人，因而终日佯狂装疯，希图逃避现实的无聊青年；其发祥地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已届烂熟阶段的今日的美国。从人民生活方式与邦交关系的接近

来说，对于喜癖士较有好感的，应该是作为美国盟邦的泰国而非社会主义的苏联才对。然而现在情形刚好相反，倒是泰国禁止了喜癖士的入境而苏联则对喜癖士推崇备至。这是有点意想不到的。这原因，大概由于泰国目前还是一种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对于太过文明新奇的事物，不大敢去领教，以防加速衝毁某些封建秩序。所以泰国宣称上述新条例的实施是为了防止社会受影响。至于苏联方面，他们现在正在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社会，对于作为资本社会的特产的喜癖士，自然是气味相投，倍觉可亲了。

(六八年九月七日)

二

“喜癖士”是干什么的？我们与其接受苏联的劳动报的高论，说是什么“真正有定轨的运动”，倒不如听听喜癖士们的自白来得可靠些。他们的政治组织——青年国际党，最近在纽约分发的“喜癖士手册”，可以视为这些青年的一幅自画像。

这本免费分发的手册，告诉失业的喜癖士，怎样可以在不名一文的情况底下过活，怎样采用正当方法或违法策略去获得免费的食物，衣服，住宿，与娱乐；而不必按照一般陈规求生存。譬如，要解决吃的问题，可到人家的结婚宴会后面讨取残羹冷馐，宣称自己是大学生，想带些食物回去给要好的同学吃，如果要解决住的问题，则可找些朋友，一起占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座建筑物住下。另一方面，手册又费了很多篇幅来进行节育指导，性病治疗指导，种植毒物指导，

吸毒时如何躲避警察突击指导，服食过量迷幻药後如何解毒指导等等。

从上述的手册的内容看来，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喜癖士者，大祇是介於孟子笔下那种到荒郊去向扫墓的人家乞食的齐人与旧时上海地方一般“白相人”之间的一种人物：贪吃懒做，游手好闲，爱享乐，爱体面，却又不願付出任何劳动代价，宁願暗地里卑躬屈膝，求人施捨；或者要点无赖手段，赚取一点小便宜。也许这样的一种人物，这样的一种生存之道，在目前的社会中，还不能算是怎样不光彩的。但也不免使人想起一个小问题：人类要求生存，要求温饱，如果不是为了进化，为了发展，而是仅仅为了保存一个躯壳，混过数十寒暑，则他们与其他动物之间，究竟又有什么不同呢？

（六八年九月九日）

汤恩比的《日本印象记》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写了一篇《日本印象记》，星洲日报通讯版最近曾连续译出，登了十天。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见出某些西洋学者在研究东方问题上的特点。他们有着一定深度的观察力，也有其相当程度的局限性。

汤氏指出现代日本人对于中国及西方的态度，是一种优越感与卑劣感的混合。他自述一九二九年间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时所获得的印象说：当时满洲的两个铁路区以及上海等处受外国管理或统治的中国领土的地区内，中国人已沦为土著的地位，所以日本人拚命地看不起中国会员，视他们为土著。然而中国会员在会议上却根本没有卑劣感，他们并不以中国物质力量一时的脆弱而感到严重的惊讶，他们既有着个人的自信，也有着对于国家前途的信心，甚至还有着对于日本人和西方人的优越感，这倒使到日本人无法把他们看成土著。

这位历史学家能从一张会议桌上观察出两个国家的学者的不同的思想感情，可以说是他有他的一套的。但这也显出他

的研究方法是多么的片面，不科学。实际上，一小撮学者——特别是出席这种会议的学者的思想感情，并不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思想感情。即使一个国家的学者，也是各种各样，不能一概而论的。日本学者固然有很多是做了黠武的军阀的帮凶，拼命地视中国人为土著；但也有不少是站在反侵略的立场，视中国人为战友，而且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而并肩奋斗着的。当时的中国学者，也不一定都有着对于个人与国家前途的信心，例如胡适博士，就写了什么《五鬼闹中华》的大文章，认为这个东方古国是事事不如人。如果说在那种会议上竟然有人毫无愧色地对着列强的代表侃侃而谈，那倒是属于少数特殊的事例而非普遍的现象。中国学者与人民的真正的信心，只有深入当时的雄壮宏伟的反侵略的洪流中才会确切体会到的。

(六八年九月十四日)

二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的《日本印象记》，谈到出席一九二九年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的一些中国会员，充份表现了对个人与国家前途的信心，没有日本人意想中的“卑劣感”，以致日本代表无法把他们看成土著，反而不时遭受戏弄，显出紧张迹象。汤氏似乎认为中国会员的这种信心，是建基于他们的个人的才能以及中国的优厚的文化传统。他说：中国会员个别都是有成就和卓越的学者，在精通现代西方技术方面，较之日本人毫无愧色；另一方面，中国曾经是日本的文化的源泉，在明治维新以前，整整四个世纪，日本在物

质和精神文化两方面，很多是取自中国的。

据我们所知，这个“太平洋关系学会”，乃是美日等帝国主义文化和经济侵略的一个机构；所谓中国会员，究竟是那些人，则目前无暇查考。然而，纵使汤氏所记述的这次会议的情形是真实的，我们认为支持着一些中国会员的信心的，主要也并非什么个人才能与古文化传统，而是一种对于军国主义者及其御用学者的鄙薄以及对于不义的战争贩子终必失败的透视。如所週知，日本的对于中国的侵略压迫，早自一八八四年派兵入朝鲜，迫使清廷签署天津条约三款之役就已开始，其後的一八九五年的马关条约，一九〇〇年的参加八国联军攻北京，一九一八年的山东善後协定，一九二五年的上海惨案，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等等，都是顶顶有名的事件。也就是说，截至一九二九年为止，扶桑岛国的侵略行径以至併吞亚洲的野心，已是暴露无遗；处于被侵略被压迫地位的人们，其敌忾情绪的高涨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出席国际性会议的文人，只要是富有反抗侵略的精神，认识到正义终必战胜强暴的，他就必然会以鄙薄的态度来回答作为侵略者的帮凶的学者的踞傲无礼，必然会对个人及国家的前途充满着信心。这种对于不义的人们的鄙薄卑视，正如奴隶们对于压迫者的轻鄙的笑一样，其意义往往是一些养尊处优的专家所不易了解的。

（六八年九月十六日）

三

有人论各国学者的治学精神，常因民族性的不同而各有

其特点，譬如德国人的精确深入，法国人的轻清明快，中国人的宽厚仁慈等等，这话也许是有点根据的。因为我们从汤恩比博士的《日本印象记》中，也彷彿发见了英国绅士的保守矜持的气质。

这位英国学者，对於许多问题都持着保留的态度，常常显得犹疑不定，避免作出适当的答案。譬如谈到中国问题时，他把中国形容为一个巨人，说她让自己给一群轻率和鲁莽的矮子用针刺和足踢了一个世纪。英国，法国，俄国，和日本都是这样的矮子。最後，这个巨人从她的长期昏睡中醒过来了。一甦醒过来就大发脾气，两隻腿站起来，做出激烈的姿势。这些究竟只是愤激感情的发泄呢？抑或是有目的地伸张肌肉，对她过去所受重创采取报复的一个前奏曲呢？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谜”。

这位历史学家不但对於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样谨小慎微，显出“谜”样的朦胧；就连对於整个人类的前途，也表示了毫无信心。他怀疑人类迟早会在第三次大战中集体自杀。他说：“我对人类活下去的前途，感到十分焦虑。我对於我自己死後，将会发生的事情，个人感到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将由我的孩子来承受。对我来说，我的活着的後代，是象征着无国籍的一代人类。至於尚未出生的，在我看来，他们的出生现在已不再有保障了”。

汤氏的所谓“无国籍的一代”，指的显然不是一种世界大同的理想，而是相当於人类用石子打猎的部落生活。一个一生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竟然无法从长期的历史发展

现象中掌握到一点客观的规律，而對於人类的未来发出这么悲观的论调，这倒是真正令人惊讶的。

(六八年九月廿一日)



“客观”报导的范例

大概是萨空了的一册新闻学著作吧，其中有一段文字在指责一些外国通讯社的记者，说他们的撰写新闻，表面看来，似乎是照实报导，保持所谓客观态度，不掺入个人的喜恶感情；事实上却是另有一套杀人不见血的阴柔手段，目的在扼杀进步力量，为某些特权人物效劳。著者当时列举了些什么例子，因看过了太久，已记不起了。但最近读到一则花边新闻，觉得也颇有资格可被举来作为一个范例。

这则花边新闻是报导美国妇女界新发起的一个反对赛美会的运动，通讯记者是这样写着——

“七十五名不欲获选美国小姐但亦不愿他人夺此荣衔的妇女，於星期六前往纽泽西大西洋城，进行一项焚毁乳罩与腰带的抗议。这批妇女自称为妇女解放运动者，其年龄由十七岁至七十岁不等。……”

“她们备有一个橙白两色的‘束缚自由之铁桶’，其中塞满了乳罩，腰带，捲髮夹，假睫毛，以及妇女杂志等等。她们把这一切称之为旨在束缚妇女的垃圾。……”

“虽然有少数人脸露笑容，或表示怀疑，但大多数人……”

……均以严肃而坚决的口吻发言，对美国最壮观的选美大会力表反对。……

“妇女解放运动当局曾明令禁止属员与男记者谈话，可是当男记者向她们采访新闻时，她们却将此禁令置诸脑后。……

“不过，这些妇女却无法说服一名头戴蓝色钢盔骑电单车的青年警员。他看不出选美大会会有什么坏处。……后来，这批妇女分乘两辆巴士首途大西洋城，巴士司机全是男的。”

新闻报导当然没有违背基本事实，然而通过一些细节的选择，段落的安排，以及“生动”的描写，这些妇女在这位记者的笔下却成了一群可笑、妒忌、胡闹，没有纪律的女丑。她们有好些已经是“七十岁”的老太婆，“不欲获选美国小姐”倒也罢了，可是偏偏“不愿他人夺此荣衔”，而且焚毁了代表美国文化的《妇女杂志》，不但可笑，抑亦可恶。难怪内部有人要“表示怀疑”了。但无论如何，她们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因为最后还要依赖男记者来写新闻，依赖男司机来驾巴士。而那位鹤立鸡群，不为她们的言词所动，坚持“看不出选美大会有什么坏处”的年青警员，则显然是这齣闹剧的正派小生，也是这位记者兼卫道者的化身了。

(六八年十月七日)

汽车与轰炸机

美国汽车一向以高大华贵见称。据说由此可以见出金元王国，物资丰饶，人民富裕，有能力享受高水准的物质生活。事实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不过这些大汽车一来到海外，难免使到流行各国的小型车相形见绌，却是真的。所以一般上总把它当做一种高贵尊荣的标志，大大小小的富儿，少不了买它一辆，以示阔绰。三几个月前北越的代表春水抵巴黎举行和谈时，也曾一度被用美国汽车接送，算是礼待上宾呢。

然而，曾几何时，电讯传来，却说是美国汽车工业，已经被迫变格，正在赶紧改製小型的经济的汽车。原因是许多美国人近时都纷纷购买来自德国和日本的福士伟根及多裕达等小型车，美国自製的大型车没有销场，厂家营业快被抢光，不得不改变方针来和舶来品竞争。据说规模最庞大的“通用汽车公司”，已宣佈将在一九七〇年推出一种叫做X P八八七型的小汽车；福特公司更将提早几个月生产它的小型车“德尔达”。预料“克莱斯勒”等其他汽车公司也将步其後尘，不会坐失时机的。

如果说，大型汽车的大量产销足以反映美国人的豪奢富裕，那么，现在的竞相改出小型车，却正好显示了美国人的普遍破产落魄，阔架子再也摆不下去，必须省食俭用，降低生活水准了。

孟子所说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确很有点道理。一个国家，又要从事侵略战争，又要人民购买力强旺，终究是不可能的。美国的战争贩子，既然要搜刮民脂民膏，发展大型轰炸机，从什么B二九扩大到什么B三六，B四七，B五二，以利於加装炸药，到海外去滥杀无辜，则人民自然不得不束紧裤带，改坐小汽车，以适应山穷水尽之后的窘境。如果侵略战争不断的升级，接着而来的不免还是这么一条虚盈消长的必然规律，就是：轰炸机愈出愈大架，汽车则愈出愈小型，以至於再次宣佈变格，改出电单车，来和日本的野马哈竞争。

(六八年十月十四日)

二

美国的许多汽车厂宣佈变格，改出小型汽车，固然说明了在金元王国中，真正有钱的不过是少数面团团的大亨，特别是几个发了战争财的军火商人；一般的升斗小民，倒是山穷水尽，有能力坐大汽车者愈来愈少了。其实，即使就大亨们的好战立场而言，省下一点物资，以供战争的消耗，也是有需要的。

山姆大叔的海外掠夺战争，消耗实在太大，单单南越一个战场，就够他们头痛。据本月十四日泛亚社引述越共司

令部的报告，在过去的八个月中，越共所击落或毁坏的东西，就有飞机七九〇架，军车三千辆（包括装甲车一六八五辆），战舰一五〇艘，兵器厂及汽车库八五五座。当然，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花旗标的。至於在北越上空一架架被击坠的轰炸机以及无人驾驶的侦察机，也还没有计算在内。

与上述的消息同时，一段法新社的电讯则引述了纽约新闻週刊的报导，说过去一年來，在越战中负有飞行任务的巨型B五十二轰炸机的机数已告倍增。一年前，美国驻在关岛泰国等地的巨型飞机共有五十一架，现今则达到一〇六架。飞行的次数也由每月八三〇次增至一千八百次。

军械被击毁，破坏，需要补充，固然是一种消耗；由於战争升级而导致各地驻军活动频仍，军需品供应增加，也是一种消耗。诸如此类的消耗，构成了一个无底洞，如果不从汽车的製造方面来个压缩，省点物资，以备填补之需，大概不久就须要学习二次大战时期的日本帝国主义，到处搜刮废钢烂铁来铸造军火了。

（六八年十月廿一日）

“美国领导”

南大的客座教授张嘉璈最近接受记者的访问，谈到世界领导问题时说：“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领导国家，大家争来争去，争一辈子也没法解决。二次大战以后，一切国际组织多在美国协助之下。因此，我们现在只有希望他们能继续居世界的重心”。又说：“美国还是个年青的国家，……因为他的富力及工业与工业技术甲於世界，不免过於自信，看事太易，求效太速，最近这次的黄金美元风潮得到惨痛的教训，当能以更深刻的眼光，忍耐的态度，来应付这个複杂的世界大局”。说来说去，总不外这么一句话：美国虽然不行，世界还是非它来领导不可。

我们没有住过美国，赚过金元，对於美国领导的好处，始终是莫测高深。若就平日耳闻目睹的印象来说，则所谓美国的领导，却似乎不是什么祥瑞的事。大抵凡是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兵）足迹所至，总免不了带来一些祸患与灾害。大则战争，轰炸，人民的死亡枕藉，文物的摧毁破坏；小则示威遊行，流血衝突，或者梅毒的蔓延，私生子的激增等等。

上週一日本的三百六十三个大城市，七十多万学生与工人发动了一次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示威遊行，要求美国撤除驻日的军事基地并交还冲绳岛，因而导致群众与警察的激战，数百人受伤，近千人被捕。这自然也是所谓美国领导的结果。然而佐藤首相仍然是捨不得美国的领导；他说：“政府将在今後严厉对付此种示威，俾法律与秩序得以维持”。

古人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倒应该说是“患在好寻领导”才对。中国一代文豪鲁迅，生前曾劝告青年“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路走”，大可不必去寻求什么领导。这话虽然是对着二十年代的青年说的，但似乎也同样适用於六十年代的一些国家。

(六八年十月廿八日)

二

正当我们的名教授在大谈“美国领导”的时候，赛珍珠基金会的副总裁兼执行董事戴维斯氏却在曼谷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大兵在好些被领导的国家中大量製造私生子的醜闻，透露仅仅泰国一地，过去四年来，美国驻军就製造了二千二百馀名私生子，年龄由一岁至四岁，其中九十五巴仙是美国大兵与泰国的吧女及舞女所生。她们是在当地的所谓“租妻制度”下和美国大兵同居的。

显然，这也是所谓“美国领导”所带来的傑作。现在的这个赛珍珠基金会，就是要来设法照顾这一大群泰美混血儿和他们的母亲，譬如教育他们，吁请一些美国家庭来领养这批儿童等等。该会的总部设於美国费城；在南韩，日本，冲

绳岛，菲律宾，台湾等地也都驻有代表，其工作同样是要使到各该地的美国大兵的私生子都能“成为社会的一个结构部份”而免受歧视。赛珍珠写了几部辱华的作品，发了横财，自然是乐得花点小钱来做这类的“福利工作”，替驻外美军的罪愆塗脂抹粉，缓和各地人民的反感。然而各地的数以千计的红髮的亚洲儿童，却正是美国大兵胡作非为的彰彰明甚的罪证，丝毫也掩盖不了的。

据说，泰国人民是普遍地强烈地反对美国大兵与泰国妇女的勾勾搭搭的。其实，一个地方祇要接受了“美国领导”，接受了美国大兵以救世主的姿态到来开拓殖民地，则各种各样的丧权辱国的事件必然会接踵而至。因而人们如果真正有自尊心的话，那就不应祇是浮面地反对诸如“租妻制度”这一类可耻的现象，而应该从根本上反对所谓“美国领导”。

(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经 理 病

根据英国医学会的调查，一般企业家，工厂长，经理，公司高级职员，或其他独当一面的领导人物，因为工作繁重，劳心过度，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健康，引起了多种疾病，如肝脏病，心脏病等，现代医学家总称之为“经理病”。

这篇报告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不要以为常常生病的只是一般劳苦大众，其实很多位高而多金的老闆或经理，也是普遍地受到病魔的侵扰；祇是病症不同，前者患的是卑贱病，後者则是富贵病吧了。

这自然也是事实。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总是出现形形色色的病人的。劳苦大众受剥削，受榨取，营养不良，贫血虚弱，鸠形鹄面，对於百病丛生固然缺乏抵抗力；然而一些列居高位的领导人物，一方面要在“劳心者治人”的表现上大展雄才，鞠躬尽瘁，另一方面又要在同行与同僚间勾心斗角，克敌制胜，那也等於日夜都在紧张的生活中打滚，不免食少烦多，积劳成疾了。

但可不能因此而得到一个结论，以为真的是“世上无情惟白髮，贵人头上不曾饶”，病魔也是不分阶级，平等对待

各色人物的。实则白髮也好，疾病也好，都一例是欺贫怕富，欺贱饶贵的。譬如对于所谓“经理病”，上述的医学会的报告就已指出：这病并非绝症，祇要按时渡长假，培养生命的新机就得了。这和一般三餐不继的劳苦大众，贫病交迫，告贷无门，不得不带病上工场的情形相比，你看差多远？

(六八年十一月四日)



西德近闻

一名受过纳粹党人的迫害的少妇克莱菲夫人在柏林的基督教民主党大会上打了西德总理纪辛格一巴掌，谴责他一度是纳粹党份子，结果被送上紧急法庭审讯，判监一年。她的律师要求法庭研究一项报告，调查纪辛格过去所扮演的纳粹角色，也遭法官拒绝，认为是企图拖延审讯时间。然而纪辛格原为纳粹党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德国外交部宣传组工作，却是尽人皆知的事。

常常有人在慨叹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历史道路的曲折。说它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固然长时期作为人家的殖民地，而经过了三年多的艰苦搏斗，取得胜利之后，也仍然是人家的殖民地；特别是它们的人民，在沦陷时期固然过着好几年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受尽汉奸浪人的百般迫害，但在击败侵略，重见天日之后，也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听由奸人们骑在头上作威作福，甚至眼巴巴地看着大批恶贯满盈的战犯一个个释放了出来，成了所谓民族英雄，大写回忆录，发表他们杀人的光荣史。那千千万万牺牲于他们的屠刀之下的

受难者，反而是死有馀辜似的。这确是当年所始料不及的。

这些自然都是实话。可是其他地方的情形看来也好不了多少。现在的克莱菲夫人的事件就是一个范例。二次大战期间，德国受到纳粹党人的血腥统治，她的家人受到纳粹党人的残酷迫害；而二三十年後的今天，西德依然是纳粹份子在当政，她也同样不容於纳粹份子而琅琅入狱。历史似乎就是这样的在循环往复着。可惜希特拉聪明一世，最後却不免懵懂一时；如果他不在柏林围城中自杀谢世，今天的西德总理自是非他莫属，怎样也轮不到纪辛格这个小角色来做的。

(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二

西德总理纪辛格，近来似乎是走了厄运，晦气十足，在柏林遭一名西德少妇重重地打了一巴掌之後，飞到布鲁塞尔访问时，又被比利时的青年学生直斥为“刺客”与“谋杀者”，二度发动示威，甚至以抛掷玻璃瓶，燃放鞭炮来声讨这个纳粹份子。最後只有依赖大批头戴钢盔，手持木棍的警察增援部队来封锁交通，逮捕群众，保護他安然离开旅馆，搭机返国。

有些政论家很喜欢发挥一种论调，说人类在政治舞台上，只有讲利害關係，无所谓是非恩怨；利害衝突，最好的朋友也要翻脸成仇；利害一致，则昨日的敌人，变成了今天的朋友，是最平常不过的事。这话對於某些掌握国政的大人先生们的集团来说，也许是没有错的。英美盟国与德国日本的情况固然不必说了，只要看看比利时政府这次對於纪辛格这个

纳粹残馀，这麼的呵護备至，唯恐他受到些儿的虚驚，而對於青年学生则警棍交加，殴打逮捕，也就可以想见此中妙諦了。

然而，欧洲的人民大众，特别是那些受尽了纳粹迫害的苦难的人士，却始终是显得憎爱分明的。他们對於是非，黑白，敌友，认识得一清二楚，丝毫不含糊。那位打了纪辛格一巴掌的少妇克莱菲夫人，在大闹基尼党大会以前，早就写过文章，闯过国会，任由公务员职位被开除，始终坚持反对“纳粹刽子手”。而在被判坐监之後，又向东德的电视观众发表谈话，声称她是以二次大战期间无数在纳粹手下受难的各国人民的名义採取此行动。又指出她那一巴掌固然是起於旧恨，但对未来也同样有意义，“因为纪辛格今天仍遵循反动政策，而且在西德境内再度建立一个纳粹国家”。这不是充份表现了一种嫉恶如仇，反暴力，反迫害的无比执着吗？布鲁塞尔青年学生的示威反对“纳粹纪辛格”，显然也是具有同样意义的。

（六八年十一月廿五日）

“感情”的照顾

《朝日新闻》的晚刊发表了一幅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驱使十六万五千名联军俘虏及东南亚各沦陷地区的劳工在建筑泰缅铁路的照片，并透露了关于这事件的一些消息。

这一条被称为“死亡铁路”的建筑，总共葬送了四万多名无辜人民的生命。战后，这事件始终成为日本方面的禁忌，讳莫如深，特别是有关现场的照片，更是绝无仅有。所以许多重要的内容，迄今仍未为世人所知。当时参加拍摄建筑死亡铁路纪录片的摄影员泉信治郎，私下保存了七十八张底片，包括一群群赤膊的俘虏，劳工，在日军的鞭笞之下扛铁轨，搬泥土，以及森林的一隅黑压压地排列着无数十字架等等惨酷的镜头，可说是最丰富的一批直接资料，但一直不予公开。在外国，则只有当时身为俘虏之一的约翰高斯特写了一部小说《死亡铁路》，暴露了若干实况。据说“为了照顾日本人的感情”，作者还拒绝在日本刊行他的著作呢。至于电影《桂河桥》之类作品，那是纯粹的虚构故事，骗骗爱看爱情片的观众罢了。今年是“死亡铁路”二十五週年的纪念，英国

广播公司计划在十一月间放映高斯特编写的特别节目《回到桂河桥》，曾通过英国驻日领事馆要求泉信治郎提供有关照片资料，却为泉氏所拒，因为他认为“可能激起憎恨日本人的感情”。结果是由泉氏自己选出一幅“客观的史料”，交给“朝日新闻”发表了事。

所谓“日本方面的禁忌”以及“可能激起憎恨日本人的感情”，那是不难理解的。当侵略者在各沦陷区姦淫掳掠，草菅人命的时候，他们是肆无忌惮的，那管什么憎恨不憎恨。他们派了一个十八人的电影班去拍製《死亡铁路》的纪录片，本来就是准备拿来公开放映，宣扬“赫赫战果”的。等到兵败投降成了战犯，那才产生了所谓“禁忌”，记起人们的“憎恨的感情”来。於是乎拼命掩盖罪行，隐藏罪证，甚至於不惜杀人灭口。中国作家郁达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连身屍也不见了。所以小说《死亡铁路》的作者高斯特虽然诚惶诚恐地“照顾日本人的感情”，日本人可并不“照顾”他的需要。

(六八年十二月二日)

二

二次大战期间，日本“皇军”确曾创造了好些驚人的“傑作”，充份表现出他们的生性的残暴与卑劣。“死亡铁路”是一宗，总共害死了四万多条人命；偷袭珍珠港事件又是一宗，除了炸毁美国的舰隻三十万吨，飞机数百架之外，炸死的军民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海军阵亡的总数多了好几倍。然而战後出现的一些有关这类事件的记述，却总是小心

翼翼地处处“照顾日本人的感情”，不尽不实的地方很多。高斯特的小说《死亡铁路》，固然显得那么诚惶诚恐，近年出版的美国教授戈登卜伦治博士的一册日本偷袭珍珠港秘辛，看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本书描写日本人怎样声东击西，故佈疑阵；怎样集结航空舰队偷渡北太平洋，逼近珍珠港；怎样出动轰炸机群，利用新型鱼雷，给予美国海军以有史以来的最大打击。这些倒也可以使人见出倭子们的卑鄙阴险的一般。但作者另一方面也拼命地替日本人傅金抹粉，把一群残暴的刽子手装扮成什么“独特”，“出奇”的“有创见的思想家”。尤其是日皇裕仁，在作者笔下更是十足的大慈大悲的佛祖的化身，先则反对侵略战争，在御前会议严肃地朗诵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今日为何起风波”的所谓“四海诗”，待到偷袭行动成功了，又煞有介事地接见那些凯旋英雄，“对非战斗员的伤害特别关心”，还频频询问：“珍珠港没有医院船吗？你们没有投错炸弹，把医院船炸中吗？”有了一位这么仁慈的天皇，所有的《虎虎虎》的勇士们，纵然满身血污，也可以借此洗脱了。

善於“照顾日本人的感情”的人既然这么多，怪不得星马华人的血债，即使七除八扣，折算为区区的一亿馀元，也还是那么难讨的。

(六八年十二月九日)

美国骚乱调查报告书

近月以来，欧美各国的人民为了不满现实而发动的示威游行，此起彼落，层出不穷，报章上几乎每日都有着这类新闻，因而也许有人会以为这些所谓先进的民主国家所标榜的集会结社自由是货真价实的，要不然它们的人民就没有这么易於採取这种表达民意的方式。加以一般通讯社的消息，语焉不详，虽然常有提到示威者与警察衝突的事件，但如不是轻描淡写，就是说什么群众向警察掷石块，抛汽水瓶之类，更加令人以为这些示威游行无异就是一种捉弄警察的轻松有趣的遊戲。殊不知实际的情形却是完全相反，好多示威游行都是警方残酷弹压下的流血惨剧。这从一两篇偶尔出现的较详细的报导中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的。最近在华盛顿发表的美国全国骚乱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的摘要，就是这么一面有用的镜子。

这篇报告书揭露了芝加哥警察在本年八月民主党大会期间怎样使用暴力镇压示威者。据称：“大多数的示威者係欲以和平途径，表示不满社会问题，或政府对南越之政策”，然而警方却“有数千次使用警棍与催淚弹”，“他们太多地

狂舞棍棒，太多地作仇恨叫嚣，太多地作不必要的殴击……所施用的暴力远远超过驱散群众或捕人所需的武力”。“有一次，骑着摩多脚车的警察衝向三四十名走投无路的群众……”；大批装束整齐的妇女，明显的无辜旁观者，“被警棍打倒在地，脸部被喷催泪气或其他化学剂，并被拖上警车”。不但“警方的暴行比示威者的挑衅更为激烈”，而且所谓骚乱事件，在若干阶段中，简直“只能称之为警察暴动”。

这报告书是一个官委的委员会起草的，内容自然还有许多保留，特别是对于“警察暴动”的揭露，祇有不及，决不会过火。但也可以由此见出这些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了。

(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瘟神？财神？

有人画了一幅美国大兵醉酒图，把这些从南越来马渡假的丘八爷称为“一群散播罪恶的瘟神”，说他们到了那里，那里的人民就无日安宁。但另一方面，却也有人把他们当做财神，一听说他们将于明年七月起停止来马渡假就表示忧心忡忡，生怕若干旅店从此失去大笔生意。


瘟神与财神，这两种说法未免差得太远了。究竟是那一方面对呢？我们还是看看事实吧。

据星洲日报驻槟城记者报导，自从美兵於一九六六年开始到槟城渡假以来，私人娼寮已经增加一倍。单单喬治市区内，就有了四十多间，如果连郊外也予计算，那就不下七十间了。这些娼寮大多分佈在美军下榻的旅社附近，内有众多应召女郎以供美军享用。因为长驻旅店的应召女郎通常是不欢迎美国佬的，於是是一般流氓地痞，乘机蜂起，大做其吃软饭的生意，这就造成了私娼的泛滥。据说这些人肉黑市场的活动也都在警方的监视中，一些未成年的少女被诱拐至娼寮卖淫的事件尤其受到注意。

又据世界卫生机构主席阿惹里鲁教授上月在吉隆坡发表

谈话称：“军人的旅遊渡假造成了目前曼谷，西贡，东京及大马各地花柳病的盛行，卫生机构有需对此加以注意，同时也应关注儿童及孕妇由此引起的疾病”。

这么看来，把渡假的美国兵当做财神来迎接，唯恐失之交臂的，除了几间下等旅社的老板之外，大概就只有一小撮专做吃软饭生意的流氓地痞而已。绝大部份的关心地方福利，妇女健康，以及下一代的命运的人们，倒真正是巴不得把那群“瘟神”连同他们所带来的大片人肉市场以及花柳病等脏东西赶快送走的。



(六八年十二月廿三日)

逃兵及其他

谈到美国大兵的渡假问题，便联想起美国逃兵的故事来。那些来马“渡假”的丘八，固然被人比做散播罪恶的瘟神，但逃役的美国兵可也不见得是什么好货色。上月间，就有一名逃离南越战场而匿藏於马六甲的央记海军，因为强掳中央医院的女护士到郊外施以暴行而被捕归案，判监六月。好在美国大使馆的人员立刻将他“送往南越受军事法庭制裁”，才免真的琅琅入狱，尝尝当地的咖喱饭。在这件非礼案以前，马六甲曾连续发生了几宗同样的侮辱少女的罪案，据悉也都是这个逃兵干的好事。

也许有人以为，逃兵既然是从侵略军的阵营退出来的，总不会是太过恶劣的傢伙吧。这就一般来说可能是对的。然而对于美国佬可就不能以常理来衡量。他们的军队素质太差了，精神太堕落了，不但那些死心塌地效命疆场的正式官军是没有灵魂的，即使是毅然退出了战场的逃兵也大多不会是高尚的人。海明威的名著《永别了武器》中的那个主角，算是逃兵中的佼佼者了，却也不过是个吊儿郎当的纵慾主义者，

只懂得偕同一名女護士溜到瑞士雪山上的旅馆去开房间吧了。那么，等而下之的，那些没有经过作家的生花妙笔给予美化，而且又是在六十年代的世界色情文化总汇陶冶出来的现实人物，能够是怎样的一种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在西贡的军事医院吊不到一个女護士，不就干脆地跑到邻近国家来当色狼？

看来，美国佬一派遣到海外来，不管是正式官军也好，逃兵也好，足迹所至，人民总是没有宁日的。祇不过他们散播罪恶的方式略有不同——正式官军是在战场上杀人放火，在所谓旅遊胜地製造私生子与花柳病；而开了小差的逃兵，则是躲躲闪闪，藏头露尾地在人家的国土上从事姦淫掳掠的勾当，如此而已。

(六八年十二月卅日)

二

對於美国逃兵，不但星马人民没有好感，欧洲国家的人士也是态度冷淡的居多，瑞典方面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星洲日报通讯版的一篇报导称：瑞典境内现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美国逃兵，当他们在一年前刚从美国战舰与西德美军基地逃到这个北欧国家的时候，许多瑞典人志願地给他们提供住屋，工作，或者捐款供他们使用，然而，时至今日，这样的情形已经越来越少，不大有人对这些逃兵所面对的问题表示关心了。而这些逃兵也越来越多地返回到西德美军基地去，因为他们的“梦想破灭”了。

按照这些逃兵以及同情他们的“观察家”的诉说，逃兵

们是很难适应瑞典的做事及生活方式的。瑞典语也不容易学习。在这些逃兵里面，没有一个获得一份具有良好远景的工作；而且斯德哥尔摩的住屋又是十分的缺乏。

另一方面，瑞典官员则表示：许多美国逃兵根本就不想做事，或者不愿从事用手工作的劳动，因之他们不能不靠当地政府的救济金去过日子。这笔救济金，每月三十四美元，会令一个逃兵不致饿死，可是如果要过一种快活的日子，便等於梦想。

这两方面的话并没有衝突，而且正好相辅相成，说明了瑞典人民何以对於美国逃兵愈来愈少关心。原来这些逃兵之所以开小差，并不是由於他们有了与美国侵略军毅然决绝的反战思想，或者对於人类的正义事业具有什么崇高的抱负，而只是为了寻求一个安全稳当的环境，避免在战场上被轰成炮灰而已。然而却又不愿为着这安全与稳当付出一点艰苦的代价，反而要求住得好，吃得好，获得一份“具有良好远景的工作”，享受“快活的日子”，可能另外还企望搞上一个女护士，过着海明威笔下的英雄美人那样的富有浪漫色彩的生活。这梦想真是太美好了。如果做逃兵真能做到这么写意，则希望做皇帝当总统的人也就不会太多了。

（六九年二月六日）

三

南越的美国逃兵逃到星马地区来当色狼，西德的美国逃兵跑到瑞典讲享受，情形似乎有些不同，实质却是完全一样——都是一批梦想在别人的国土上过着所谓“好的生活”或

“快活的日子”的吊儿郎当的宝贝。

自然，有些逃兵是否认他们的“梦想破灭”是由於物质生活的不满足的。譬如有个叫做雷钟士的黑人，他是第一个由西德溜到斯德哥尔摩，又从斯德哥尔摩首先返回西德去归队的美国逃兵。他回到美军基地後发表谈话说：“如果我（在瑞典）逗留下去，他们（指美国人）会认为我是一个共党份子。然而，對於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错误的，不适合的东西”。又说：“瑞典人對於黑人有一种自然的偏见”。

可是，就连同情这类逃兵的境况的西方国家的记者，也认为雷钟士的话并非由衷之言；所谓肤色的偏见也不足以解释何以美国逃兵普遍地感到他们的梦想的破灭。因为黑人在美国逃兵中祇不过占了百份之十五的比率而已。

显得较高尚，较有光彩的美国人当然也是很不少的，但却不是出现在他们的逃兵或正式官军里面，而是出现在他们国内的一队队坚苦搏斗的反战行列之中。譬如同是黑人，同是成为新闻人物之一，那个宁願被抓去坐牢，宁願被世界拳击总会宣佈取消其重量级拳击冠军荣衔，却始终拒绝被征召入伍去参加侵略军的拳王克雷，比起上述的逃兵雷钟士先生来，形象可就高大得多了。

（六九年一月十三日）

四

拳王克雷由於拒绝参加兵役，被美国政府抓去坐监；出狱後要到外国去举行拳赛也被禁止，因为他是一名“安全的

危险份子”。最近他正以演讲写作等方式在筹款还债。据说目前他的负债是卅八万美元，大部份是他与政府之间的法律纠纷所造成的。

这些倒还不算怎样奇怪，最有趣的是世界拳击总会也因他的拒绝参加侵略军而判决取消他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的令誉。现社会的一般有势力的集团，常常以为憑藉它们的财力权势，對於任何人事，都能按照它们的爱憎喜恶，生杀予夺，任所欲为。它们可以通过封官赐爵，颁赠荣衔等花样，製造大批的军政显要，学者名流，也可以採用什么“褫夺”，“取消”等手段，使到许多人身败名裂，声誉扫地。克雷的被宣佈取消其世界拳王的冠冕，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的产物。其实，它们所能够随意加以摆佈的，祇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傀儡而已；许多全靠自己的真材实料而出人头地者，却不是一纸什么判决书就能改变其地位的。高尔基虽然被褫夺了科学院院士的衔头，终究还是“苏联文学之父”。罗曼罗兰也有类似的遭遇，却也仍然是世界的大文豪。联合国虽然始终拒绝某些国家加入，但大家都知道这是鸵鸟式的无视现实的做法。现在的拳王克雷的事件，情形还是一样。除非世界拳击总会能够安排一场拳王争霸赛，在最公平的比赛条件下让更强的对手将克雷打倒，否则即使三申五令，宣佈取消他的拳王荣衔，也仍然是无济於事的，不过徒然暴露这个体育机构的作为美国好战集团的工具的本质吧了。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克雷始终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世界拳王。

(六九年一月十八日)

电影杂谈

报章的电影版有一则短讯说：一向以大胆暴露著称的好莱坞女星珍罗素，最近也批评起美国电影来，认为“讲性的太多了”。

好莱坞的电影中所展示的肉比肉店里的肉还要多，这已经是有口皆碑的事，现在却连著名的肉弹也看不顺眼，发为讥评，那就不能不说是有点儿特别。

何以美国电影的暴露的镜头愈来愈多呢？我想这与商业社会的生意竞争是分不开的。电影本来是肉体暴露的先驱者，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暴露艺术，原是从银幕上学来的；正如许多打劫银行的强徒从电影上汲取他们的技术知识一样。然而时至今日，一般女性的暴露狂，却有了青出於蓝，使到第八艺术里面的大胆演技相形见绌之势。去年下半年纽约华尔街的那一场“大胸脯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起初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写字楼的女职员在华尔街出现，那迷人的突出部份引动了大批经纪人如痴如醉地跑出办公室来争相欣赏。接着是越来越多的大胸脯的女郎涌到华尔街来炫耀她们

的胴体，不过到此刻为止，大家还祇限於穿着运动衫的表演，不久可就来了四个曲线玲珑的少女，脱去内衣，裸露上胸，从一个金融市场走到另一个金融市场，争取“睇肉家”们的赞美，并向围观如堵的人群作自我介绍，结果终於将前此的一系列对手击败。

既然满街满路都有公开的肉弹展览，观众不但得以不费分文而饱睇酥胸，而且接触的尽是曲线毕露，真刀真枪的实物，胜过银幕上的隔了一层菲林片的影象多多；相比之下，自然会觉得电影是可看可不看的了。这對於好莱坞的影片业不消说是个大大的威胁。製片家为了把观众从街头的免费的实“弹”表演抢回来，就不得不大暴露特暴露，提供更多，更精彩，更彻底的肉的镜头了。

（六九年一月廿日）

二

好莱坞影片的暴露的镜头愈来愈多，以至於连影城本身的著名肉弹也看不顺眼。我们认为这是美国的製片家在与公共场所的免费肉弹展览互争观众的结果，那倒不是讲的笑话。实际上，好莱坞的电影，不但要面对纽约华尔街的“大胸脯之战”一类活剧的竞争，同时也要面对众多西方国家的各式各样的裸风以至电影同业的裸体片的竞争。

在哥本哈根，无上装的女售货员已经上市了，她们被摆在商店里任人观赏，以协助推销色情杂志。据说，有关商店的生意，因此旺了一倍。

在伦敦，电影与电视上，裸体镜头已出现多时。製造商

利用裸体广告画来推销其产品，更是平常不过的事。卖香皂的广告画中的裸女，多数还剩下一条紧身裤，据说对象是女顾客，所以比较斯文点。至於流行唱片的广告，那就尽是赤条条的裸体影照，披头士伦农和他的情妇大野洋子全身赤裸，横卧床上，就是精彩画面之一。

裸风不但吹遍了一般公众场所，同时也吹进了一般文学艺术团体。譬如，底特律市郊的奥克兰大学，一名廿一岁的学生在教室里当众裸体诵诗，据说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伦敦教皇的艾尔伯大会堂举行流行歌曲音乐会，则有一名年轻的金髮女郎把全身脱得精光，怡然自得地在听曲。当警察企图把她带走时，其馀的听众更竞相脱衣，大喝倒采，以示抗议。

在这么一个裸风狂吹，露体是尚的世界中，好莱坞影片的力争上游，大爆肉弹，以广招徕，也算是自然的趋势了。

（六九年一月廿七日）

三

西方世界，裸风狂吹，不但公众场所以至艺术团体中，竞尚脱衣裸体，就连一些政治性的活动，也有了精彩的无上装表演。例如汉堡的一名女学生，因在“左派社会主义”德国学生会所策动的一次示威遊行中表演脱衣，展览双乳而被捕，她的七名女友也一齐拥到法庭，举行“露乳示威”，高喊社会主义口号，大吵大闹，迫得法官只好下令放人。

既然“左派社会主义”者也公然以肉弹作为示威行动的武器，则好莱坞电影的当仁不让，以彻底暴露为号召，就更

加不足为奇了。

真正奇怪的倒是：好莱坞影片的肉的展示愈来愈多，对于一些以肉弹著称的女明星，照说应该是更加有利，更受欢迎才对，何以其中又有人要表示看不顺眼呢？难道牠们还存有一点羞耻心，不敢作过份的暴露？或者顿萌善念，不忍目睹太多的肉林来毒害青年么？那自然不是的。

原来这也是商业社会中的一种生意竞争。有些女明星，由於演技不到家，乃另闢蹊径，以大胆的肉体暴露来为自己在影坛上争得一席之地；但另一方面，也因为她是女明星，毕竟还有一点起码的演戏工夫，与华尔街那些只会袒胸露乳，纯粹以色相诱人的大胸脯女郎又略有不同。如果製片家完全以裸体女郎为号召，则任何一个具有大胸脯的天赋的写字楼女职员都有资格随时上银幕，当明星，成为影迷的新偶像，再也不需要什么表演技术了。这么一来，影城原有的一群著名的肉弹也就不见得吃香了。她们耻於与那些大胸脯的女郎被人等量齐观，也预感到自己在银幕上的地位的岌岌可危，这才是她们对于影片太多过份暴露的镜头表示不满的真正原因。

（六九年二月三日）

四

现代商业社会中，到处是剧烈的生意竞争。好莱坞的暴露影片与街头巷尾的免费的裸体展览在竞争，影城的肉弹与一般的脱衣女郎在竞争。有些著名的肉弹对于银幕上的过份暴露表示看不顺眼，显然的，她们的理想的暴露镜头，乃是

一种半隐半现的画面，既不是不敢大胆的暴露，也不是过份的完全大胆的暴露，好让她们那一点点粗劣的演技还有些儿用武之地，以免银幕上的地位受到那些仅仅懂得展示大胸脯的写字楼女职员的威胁。然而，这祇是一种幻想而已。

好莱坞的电影，昔时并不是以脱衣裸体来作号召的。虽然它也有许多影片是以性和肉为中心，但真正卖座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一批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社会现实，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的作品，如卓别麟的《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等。此外，製作技巧上的经常有些新的发明，也不失为一个讨人欢喜的因素。诸如摄影技术，剪接技术，表现方法的某些改进；施素德美的大堆头大场面的所谓宗教巨片，狄斯尼的米老鼠卡通片；以至较为晚出的立体片，阔银幕等等，都曾先後热闹了一阵子，教观众掏过腰包的。祇是到了近年，由於纽约大老闆的愈来愈紧的控制，好莱坞的电影愈来愈无灵魂；同时摄製技巧的发展也已山穷水尽，搞不出什么好花样来，於是大量的暴露影片才代之而兴，成为吸引影迷的一项新噱头。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好莱坞影片今後的趋势：除非它能在内容或形式方面有所创获而推陈出新，否则就只有更进一步地朝向春宫片发展，定然无法保持一种既要暴露，又不要太暴露的境地。

（六九年二月十日）

五

有人在写文章讨论“电影与观众谁走得快”，内容如何，

因未留意，不得而知。但若单就色情影片而言，则答案是明显的：电影比观众走得格外快。

当我们还在谈论好莱坞的暴露镜头的时候，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各国的性爱电影早已源源出笼，把电影业推上一个新纪元了。这类性爱影片，起初祇是以强姦，生子，虐待狂，被虐待狂等为题材，或者表演一些女人同性恋，男人同性恋之类的动作。最近的发展却是愈来愈“精彩”，男女造爱的镜头不但大量出现，而且花样百出。报载丹麦电影界不久将在香港举行一个电影节，其中就有两部造爱的影片。那一部叫做什么《饥渴》的，描写一个囚犯被邀参观一对夫妇做爱，猥亵的“奇景”达三秒钟之久。

但这还不算是性爱的巨製。最为别开生面的当推意大利的一套什么《性爱迷宫》。内容是一对未婚青年男女当众做爱，还邀了大批医生，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等等来进行实验，其中除了动作与声音之外，连肌肉血压的反应，心脏跳动的次数，也都有着生动的纪录。据说这并不是像时下的同类电影一样，利用科学的题目来表演性爱，大刮其龙；而是非常科学，非常认真来处理的一部严肃的片子，没有堕落下流的镜头。看来电影固然是走得比观众快，电影广告的进境也是一日千里的。

(六九年三月三日)

六

从色情影片的发展来看，电影不祇是比一般观众走得快，而且是远远地走在那些最精明的预言家的前面。

英国的一个影剧杂志揭载了一段预言，标题是《赤裸裸的真相》，说二一六八年的报刊上将出现这么一则消息：某名女星宣布将在下一部新片中穿着衣服上镜；这是为了剧情的需要，所以不惜牺牲。但这大胆的演出将闭门拍摄，不让任何人参观云。

这段预言乍看起来确是“极尽幽默的能事”的，其实却还是十分保守的说法，电影明星裸体上镜是正规表演，穿起衣服来反而是一项大牺牲，这样的一种现象完全不需要像它所估计的要到二一六八年——即两百年后才出现；在目前，已经差不多就是如此这般情形。许多女明星都已不以赤身露体为可耻，相反的，倒是没有裸露的机会才使她们感到失望。本来演裸体戏还仅限于一些有天赋健美身材，足以展示性感的肉弹；现在则连一般“瘦弱骨感”，体态并不婀娜的女星也要在广大观众之前作裸露的表现。还有一些较保守者，原先只允作有限度的暴露，近来也都改变作风，毫不保留了。她们的新论调是：“人体有什么奇怪骇人的地方呀？”

今天，电影业已经晋入了造爱片的时代，单纯的裸体片可说是过时落伍的东西了，然而预言家们却还在预测“赤裸裸的真相”之类，而且推算为两百年后的事；显然的，比起预言家们来，电影是走快了两百年的。但也可以反过来说：西方社会的腐化，糜烂，崩塌，比一般的预见还要早两百年。

（六九年三月十日）

七

报章的电影版有一篇文章在慨叹战后初期以“单车窃贼

”一片成名的意大利导演德西嘉，这几年来经已寂寂无闻。因为所导演的片子愈来愈退步，不是流於滑稽风趣，就是谈情说爱之类，锐气尽失，再也没有几个影迷记得他了。

其实，这种退化与衰落并不单是德西嘉一个人的情况，而是全意大利以至整个西方世界电影业的总的趋势。有人指出过，大製片公司的老板们，一向的态度是提供最大的娱乐，赚取最多的金钱，後一点尤其重要。至於什么道德良心，教育作用，那是不在考虑之列的。虽然有时也会拍摄几齣较有社会意义的片子，却是因为不如此就赚不了钱的缘故，并非长期的营业方针。例如三十年代初期，好莱坞出现了好些反映经济大萧条情况的影片。失业，饥饿，倒闭，破产……的阴影，陆续上了银幕；选举，法律，新闻等等公共生活的黑暗面，也成了影片的题材；一些更具有本质意义的罪恶事项，也差不多在银幕上呼之欲出。因为在经济大萧条中，人们的生活痛苦万分，對於什么警匪枪战或男欢女爱一类的事情，再也看不下去了；祇有内容稍为涉及生活现实的，才可望观众掏腰包去欣赏。然而，在製片家的心目中，这还是娱乐，还是为了赚钱。而且这种暴露社会实质的影片的摄製，也祇能适可而止，那才不致於和大亨们的根本利益衝突，所以好莱坞不久也就改变了作风，大量推出歌舞片，引导观众逃避现实，忘记经济大萧条的痛楚。

明白了这种底细，對於意大利电影的日趋衰落，名导演目前的寂寂无闻，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原来二次大战结束後的意大利，整个社会百孔千瘡，人民的生活都失了常轨，

只有《单车窃贼》，《米兰的奇迹》等富有现实性的片子，才能使到人们出钱去看戏，德西嘉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一举成名的。但点到为止，花样翻新，正是製片家们所需要的。因而近年以来，意大利的色情影片，造爱镜头，源源出炉，德西嘉的产品也每况愈下，但就大亨们的提供娱乐与多多赚钱的基本态度而言，则是始终如一的。

(六九年三月十七日)

八

西方国家的一些比较进步的电影工作者，近年来声誉消沉，显著退化的，除了战後初期以《单车窃贼》一片成名的意大利导演德西嘉外，差利卓别龄也是被人特别提起的一位，而且是更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卓别龄享誉影坛逾四十年；名气，成就，都比德西嘉大得多，早在二十年代以前，他已获得广大观众的热爱。他的思想与演技随着时代而日益进步。当好莱坞的许多大製片厂都成了华尔街金融巨头的囊中物之後，他始终是独立的製片家，不向大老闆们低头。当八大公司在粗製滥造，大量推出什么歌舞片，西部片，警匪片，宗教片来“提供最大的娱乐”的时候，他始终是严肃地工作，拍摄了一系列真实地反映时代，鼓舞人类起来改善社会，反抗压迫，争取幸福与和平的电影史上的傑作，如《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华都先生》等，以致被人目为最强硬的叛逆者，加以无穷的迫害与污辱，最後終於被宣佈不许再在美国居留。差利当时誓言：“纵使耶稣基督当了美国总统，我也不愿回

到那个国度去了”。一般预料，这位影人将会有更积极的控诉与反抗的。没想到十多年来，他祇拍了《纽约一王》与《香港女伯爵》两部片子，描写人生的悲欢离合，倾向於逃避现实。特别是《香港女伯爵》，更把他远远地抛在时代的後头。这部影片叙述一个白俄妓女，从上海到香港，千方百计地设法投奔美国，和卓别龄当年的誓言真个是相映成趣。而更可注意的是该片的艺术风格，据说：战斗的精神，尖锐的讽刺，机智的幽默，都已不再存在；有的祇是前途茫茫的意识以及隐藏着肉慾的对话。难怪论者们要称之为“差利卓别龄的蜕变”了。

(六九年三月廿四日)

九

报载一名准备与女歌星朱蒂加兰结婚的美国商人，将他在美国各地的五百座联号影院赠送给他的这位未婚妻，称为“朱蒂加兰影院”。据说，这些影院每年可替她赚取一百万美元，她的後半生再也不必出来演唱了。

一个商人的一次赠礼就是五百间影院，这一现象的意义不在於显示金元王国的豪富无比，而在於说明西方国家的影业是如何的集中在少数大亨的手上，同时也正好用来解释这些国家的一般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何以总是易於遭受时代的淘汰，无法始终坚持他们的艺术立场。

在电影业发展的初期，由於技术幼稚，对观众的吸引力不大，既不能赚大钱，又显不出它的宣传功能，大老闆们对於它是毫无兴趣的。到了电影的製作渐臻完善，影迷日众，

开始发挥它的社会价值的时候，一般金融巨头就来了，他们威胁利诱，拉拢收买，把整个影业抓到手里，紧紧地控制着这一个艺术部门，用来作为自己的宣传工具，拍摄些符合於他们利益的影片，既以发财，也以愚民，真个是一石二鸟，得其所哉。这么一来，不但许多製片厂都先後集零为整，合併成若干大公司，归入少数财团旗下；戏院也有了成串的联号，构成了所谓“院线”，操纵着影片的发行排映。而电影工作者也只好乖乖听话，随着大企业家的指挥棒起舞了。因为影片既是一种高成本的製品，又需要有固定的适当的放映场所，个人才能的表现通常是比画家的举行画展，作家的印行书刊要受到更多的制约。

显然，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倘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效松柏之後凋，那是需要有比画家或作家等更多的勇气与毅力的。

(六九年三月卅一日)

“独立思考”

被誉为“熟悉东方人思想”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最近发表演讲，谈论时局，论调可谓独树一帜，与众不同。

一般人批评美国介入越战，大都谴责美国为了少数金融寡头的利益，干预他国内政，侵略别人土地，把青年们送到亚洲当炮灰。唯独赛珍珠对这问题另具高见。她所关心的不是美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是美国未来的总统与领袖人物的丧失，以及“美国目前已有缺乏领袖人物之迹象”。她认为这才是“越战之悲剧”。她还把二次大战时期英国人民的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拿来和美国好战份子目前的侵越战争相提并论，理由是英国当时也“损失了许多伟人”云云。

提到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在北韩被击落事件，她的意见也是非常独特的。一般人大祇是谴责美国飞机渡洋过海，鬼鬼祟祟地到人家国土的上空来当间谍，以至行藏暴露，丢人现眼。然而在赛珍珠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家庭教育的问题吧了。她说：“北韩有如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如果你有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你就不能约束他。”这意思就是：美国根

本无须出动侦察机，星条旗早就应该插上北韓的领土，教北韓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才对。

西方国家的许多学者名流，一向都在大力提倡“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赛珍珠这篇演讲词，实在可以列为“独立思考”的最佳范本。

(六九年五月五日)

二

时代在动盪变化，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名流的思想言行也经常有些改变。有的变得愈来愈难看；如美国的女小说家赛珍珠的埋怨美国“宠坏”了北韓，以致“不能约束”这个“娇生惯养的孩子”。有的则变得更为正直些；如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从鼓吹非战到在巴黎设立战犯法庭，“审判”越战罪犯。

英国名史学家汤恩比也是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汤氏以前在谈论到越战或有关事件时，常常是吞吞吐吐，含糊其辞，祇是说些对於人类前途感到焦虑之类的话。这一次在他八十岁诞辰出版的新书《经验谈》中，态度却是比较爽朗了一点。他明晰地指出越战是一种殖民地战争。“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主义浪潮消退後，美国浪潮就立即隨後涌进去。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跟它过去在朝鲜进行的战争一样，都是企图在东亚，上自日本南韩与台湾，下至南越与泰国，建立一个美国殖民地帝国的图谋之一部份，而且还包括以恰当的地理观念来说属於东南亚国家的纽西兰与澳洲在内”。就在现阶段，这个“美国殖民地帝国”已经採取美国保護国的方式来

保護名义上仍属独立，但是实际上已变成美国的“卫星国”的国家。汤氏警告说：“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胜利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将是美元贬值，千千万万美国青年人命牺牲以及其他世人道义上谴责美国”。

这种明剖直析，不大含蓄的批评，对于这位史学家本人来说，似乎不失为一种新的现象；虽然里面仍然少不了一些西方学者所常有的奇特论调。

（六九年五月十二日）

三

西方国家的学者名流是强调所谓“独立思考”的。这就是说发表出来的思想言论要能与众不同，愈新鲜愈好。许多大博士小博士的学位论文，更是连研究的范围也绝对避免与别人雷同，似乎别人所讲过写过的题目，就已经是真理所在，不值得重複探讨了。然而天下毕竟没有那么多的完全崭新的话题，因而学者著作也好，博士论文也好，内容真正新鲜的实际并不多，流於奇特怪诞的倒是所在多有，汤恩比的新书《经验谈》也没有例外。——虽然他对于国际时局有了些新的认识。

譬如，他警告美国：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胜利”将招致其他世人道义上的谴责。“这种谴责跟德国在纳粹政权下，日本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以及苏联在史太林统治下所遭受的一样严厉，一样普遍”。把美国在越南的殖民地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由一九三一年的东三省事件开始）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侵略战争等等，拿来和史太林

时期的苏联内政问题併为一谈，这在一般未曾受过“独立思考”训练的人看来，未免是不伦不类的。

同样有趣的是汤氏對於正义战争的看法。他说，他现在“很提防所谓一个国家为了自卫而进行正义战争的老说法”。因为他“发觉正义很少完全屬於某一边的”。这就是所谓英雄和妓女都有缺点，所以世上没有完人的论调。也许汤氏还不知道他的这个新的“发觉”，其实也仍然是一种“老说法”。



(六九年五月十九日)

今日苏联

星洲日报的通讯版登载了一篇《今日的苏联社会》，里面包括了好几位外国游客所写的旅苏印象记的摘要。大家的看法都是：今日苏联的社会风气，与西方社会没有多大分别，甚至可以说完全是西方式的酒色财气的社会。

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木村写道：在莫斯科的大饭店里，客人随着爵士音乐疯狂摆动，狂扭乱摇。在跳舞的人群中，可以看到穿着大露背晚礼服的女人。……巴黎流行的东西，一个月内就会在莫斯科流行起来。

另一段报导则说：在莫斯科设立的一间性病诊疗所，工作显得极为忙碌。这间诊疗所是苏联第一间性病诊疗所，由公共卫生心理研究所主办的。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之故，所以开办以来，青年男女都纷纷蜂涌前来求诊。那些候诊者的名单，目前已一直排到一九六九年底。由此可见今天的苏联人，由於受了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除了酗酒等外，还大搞男女不正常关系。奇怪的是苏联政府对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半句批评，反而经常有意鼓励。

为什么苏联政府要鼓励这种现象呢？这些通讯都没有答案。这里倒要借重一位朋友讲的几句笑话了。他说：这是马克思列宁等人的智者千虑的一失。他们所殚精竭虑的祇是怎样改革社会，使穷人变成富人；却没有提防一些人一旦成为新的富翁之後，也就有了不同於穷人的想法，认为还是与西方社会看齐，把国家带回到酒色财气的世界去好些。

(六九年五月廿六日)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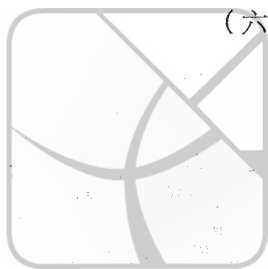
报章上近时常常出现一些有关苏联社会情形的报导，其中由日本人写的似乎更多。上述通讯版的一篇《今日的苏联社会》，里面有好些片段就是日本人的旅苏观感。朝日新闻的记者木村描写了莫斯科大饭店的疯狂的音乐与舞客，东京大学的教授林健华太郎则揭露了苏联官场的贪污现象。

这位教授认为在苏联“贿赂最有效”。据说，日本商人曾与苏方谈判商业贸易，由於见不到苏联的国营公司经理而一再拖延下去。後来，日本商人把从日本带来的礼物送给经理的女秘书。很快，这位女秘书跑来说：“经理马上会见你。”有时通过普通的途径总解决不了问题，只要同上面的人搞好关系，问题就能简单地得到解决。

一个国家从被称为无产阶级的独裁变成了与西方社会没有多大分别，的确是很有趣的，难怪日本的学者报人喜欢前往猎奇探胜。但如果回顾一下日本人本身對於苏联的看法的变迁，可能也是同样趣味的事。大概是一九五九年前後吧，日本的许多大报社曾经招请大批第一流的学者专家举行一系

列的座谈会，讨论苏联当时与中国及阿尔巴尼亚诸国发生论争的原因，结果发表了不少新奇的看法。譬如说苏联因为曾遭受过最现代化的战争的摧残破坏，又没有领土被割裂的情形，所以比较爱讲和平过渡；同时由於苏联目前核武器已高度发展，有恃无恐，所以不像中阿等较落後的国家對於美国的扩张侵略势力那么慄慄危惧以及對於亚非民族的新兴力量与人的因素那么重视。这种高见和日本人今天的着眼於苏联社会风气的倾向比较起来，可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变化。

(六九年六月二日)



周作人的回忆录

汉奸周作人在本地报章发表的长篇回忆录，已经接近尾声，其用意也已非常明显了。这使我想起一位英国报人的几句话，他说：“当我每天早上吃半生熟蛋的时候，祇要稍为敲破蛋壳，不必完全打开来看，就已经知道了那是好蛋还是臭蛋”。

周氏这篇回忆录的写作动机是极为恶劣的。他的首要目的便是想替他在敌伪组织任职的事做点开脱的功夫。他最爱讲的一点是：七七抗战爆发後，他没有随北大南迁，而仍然留在北平者，是因为系累太多。记得这些话他已在其他场合讲过不少次了。一两年前港报上揭载过的他的一封写给一些香港的没落文人的信，里面就专谈这问题，还特别指出那是为了照顾他的妻小和鲁迅的家属的缘故。信中同时借机反噬，大骂别人没有家累，所以大可去充烈士云云。那信写得火气满纸，面目狰狞，他平素所提倡的所谓“冲淡”的风格，终究掩饰不了他的原形。

大凡当汉奸的人，总是有些“理由”可以用来自我辩護

的。其中最常见的是所谓个人环境问题。好像造化特别亏待了他，别人的环境没有一个不是比他好的。这真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的无可救药的悲哀。好在家累和他同样繁重的闻一多教授在昆明学刻图章，艰苦地养活一家大小的事迹还未为人淡忘，否则周氏的回忆录就要更加振振有词了。

(六九年六月九日)

二

周作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声明对于“在敌伪时期所做的事”一概不写。“因为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来记述，难免有近似辩解的文句，但是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总之是说他的汉奸行径，大家都已知道，不必写了。

其实，他那几十万字自传，根本就没有任何新鲜之处，所写的大部份也都是“人所共知”的东西，例如他那两首什么《五十自寿诗》，当年在林语堂的《人间世》登出之后，大批无聊文人，纷起唱和，闹得满城风雨，成了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大“奇迹”，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了。当时陈子展等人看不过眼，故意步他的原韵作诗痛斥，其中有些警句，如“不赶热场懒似鹤，自甘凉血冷如蛇；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误尽苍生谁是责，清谈娓娓一杯茶”，我们直到现在也还依稀记得。诸如此类事件，不是比他在敌伪时期所做的好事更加多人知晓？然而他却不厌其详，津津乐道。当然，他是不会把陈子展诸人的诗作写出来的，只是大抄特抄钱玄同蔡元培等腐气相同的和诗。可见事实上他并非真的以是否“人所共知”作为材料取舍的标准，而是凡是可

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或可以尽量拉长篇幅以便向香港某一没落文人多换几斤花旗麵粉的，就加倍的渲染；凡是对於自己的醜态有所暴露的，就多方掩盖，而美其名曰“不辩解主义”。

而这个“不辩解主义”，却正是他所採用的辩解妙法。

（六九年六月十六日）

三

周作人对於他在敌伪时期当汉奸的劣迹，虽然声明奉行“不辩解主义”，实则还是旁敲侧击地做了许多辩解的工夫。除了这所谓“不辩解”本身就是一种辩解之外，他还着重指出下列几点：一，他的留在北平是为了“系累太多”；二，他在北平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九三九年元旦的被刺，就是日本人的阴谋迫害；三，他在敌伪时期写了好多“积极的有意义的”文章，以致被日本人称为“反动老作家”。——最後这一点他讲得最多，也是他最想取信於人的一点。

究竟他在那时期写了些什么“积极的有意义的”文章呢？坊间有一两册什么《药堂杂文》之类，就是他的这些大文章的结集，读者如有兴趣不妨买来欣赏欣赏。但最好莫如看看他自己在回忆录里面所摘引的那一些。因为那么一抄再抄，显系得意之作，最有代表性的。特别是那篇什么《遇狼的故事》，全文约三千字，一字不漏地收录了进去，郑重无以复加，意义自然是更“积极的”了。那么，我们就看看它的内容吧。

这是“民国甲申，一九四四，驚蛰节，在北京”写的。

主要是说若干年前，有个青年，心想研究一种什么学问，曾经请他帮过忙。后来，这青年忽然左倾了，还劝他“附和”他“始终不懂”的文学论，他却敬谢不敏，於是闹了起来，一面玻璃窗被打碎了。——这就叫做遇了狼，被咬了。

原来，在日本人的指挥刀後面为文痛骂左倾青年，就是他所谓的“积极的有意义的”写作。

(六九年六月廿三日)

四

那篇又长又臭，据说共达三十八万字的什么知堂回想录终於在本地的报章上登完了，我们对于这个老汉奸撰写自传的意图也看得更清楚了些。原来他在那所谓“不辩解主义”的幌子底下，除了为他在抗战时期参加敌伪组织的劣迹力求开脱之外，还始终企图为他在落水以前许多令人反感的事件进行辩護，甚至反噬。

例如，他特别提起一九二二年间他与鲁迅失和的事件，然後自言：“对于鲁迅研究提供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同时，他就乘机攻击许寿裳，指许氏“造作谣言”。按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有一段文字记叙鲁迅与周作人而不和而迁居後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的情形：“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一段记述怎么是“造作谣言”呢？据这个“

不辩解主义”者的辩解说：当时到来的是徐耀辰与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

他把这个辩解美其名为“有要订正的地方”。但却似乎愈“订”愈不“正”。因为他并没有告诉读者，当两兄弟为了家事而在家里发生争执的时候，两位北大教授的光临，如非称为外宾，那又要叫做什么呢？

（六九年六月卅日）

五

老汉奸周作人编造了他那卅八万字的辩解书之後，作为他的海外代理商的香港投机文人也知道那些鬼话是没有人相信的，於是另外写了什么《评介知堂回想录》和《知堂老人的晚年》来作“详细交待”。说是要告诉“百年後史家”，抗战胜利後，“老人羈押南京老虎桥经年”，但却“没曾判罪”。又说蒋梦麟的两段回忆录是“直接史料”，可以证明“启明老人奉蒋校长命，留守北京大学”。

为什么要特别针对“百年後史家”来“交待”呢？这正是汉奸与投机文人之流深谋远虑的所在。因为百年後的史家，不一定很清楚百年以前的金陵残照里的法庭，早已一塌糊塗，有庭无法，加以官官相護，大大小小的汉奸，“没曾判刑”的正多着呢。

同样的，百年後的史家，也不一定会留意到百年前的汉奸和準汉奸们的互相勾搭，歪曲史实的那些细节。例如，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周作人自言当时北大的一些教职员曾开会讨论要不要随学校南迁，他因家庭“系累太多”，决定不

走，一九三七年年底，始接蒋梦麟一个电报，叫他保管在平校产；然而到了战後，他在法庭的辩词及蒋梦麟的文章中，却变成了“留在北平并不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现在，到了香港投机文人的笔下，又要进一步演化成了“周氏留在北京看守校舍，乃是蒋氏的命令”。从家庭“系累太多”，决定不走，曲曲折折地敷衍为奉令“看守校舍”，所以不走，此中巧妙，百年後的史家自是不易识破了。

(六九年七月七日)

六

香港的投机文人写文章为周作人的回想录帮腔，除了企图证明抗战时期周氏留在北平“并不想做汉奸”之外，还披露了周氏的一封私人信件，企图将他与鲁迅不和的一类事，嫁罪於许广平对他的“偏见”与“迁怒”。然而我们却从这信中看到一个真正的事实：这个老汉奸自从由南京老虎桥获释以後十多年间，竟是丝毫也没有一点进步迁善的痕迹，难怪最後終於被列为黑帮。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早就揭露过：“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这些文字周氏晚年也已见到，但从信中所谓“内人以同性关系偏袒朱夫人”那种欣欣自得的口气看来，他是直到临死以前还是认为他那日本婆是怎样的好东西的。这种“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而至死不悟的人，会去当汉奸也就没有什么

奇怪了。

信中极力赞誉香港投机文人之所谓鲁迅的政治观及文艺观“根本是虚无的”，又说鲁迅“死後任人摆佈，说是纪念，其实有点那个，……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这里更加暴露了他的汉奸本质。他虽然自称提供了两种鲁迅研究的资料，其实对於鲁迅是自始至终毫无认识的。他与鲁迅间所以兄弟失和，成为参商，以至後来陷入迷途，无法自拔，到了晚年又与周扬等人为伍，寻求庇護，終於沦为牛鬼蛇神，这一点正是关键所在。

(六九年七月十四日)

七

關於老汉奸周作人，还有一两件事应该指出。

不管他在抗战时期留在北平，是为了“系累太多”，还是为了奉蒋梦麟的命令“照顾学校”，这些都不能拿来作为他的参加伪组织的汉奸行径的辩词，蒋梦麟战後虽然曾帮周氏说话，承认曾一度“示意”他不要走，这也祇能证明蒋氏的糊塗透顶，在那个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还在斤斤於“一些图书和设备”的保存。这种目光如豆的人，怪不得終於要走出石头城去写他的回忆录了。

周作人对於鲁迅根本毫无认识，他的自传中虽然也常常称道鲁迅什么什么的，目的却纯粹是在利用鲁迅。如谈到他的五十自寿诗受攻击的事件时，就一再引述鲁迅书简中的一段文字，说是替他“主持公道”。实则鲁迅为了顾念兄弟情谊，一向都避免在文章或朋友的通讯中批评周作人。鲁迅的

文艺观是鲜明不过的：文人清谈虽不一定关系国家兴亡，但文章却不能随便乱写；因为作品一发表出来，就为社会所有，要对读者负责的。全部鲁迅全集的积极严肃的态度就是他的这种思想的最好说明；他在写给唐弢等人的许多信札中也常常宣示这种观点。

因此，对于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的最标准的批评，并不是鲁迅书简，而是陈子展等人的和诗。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个老汉奸确是“自甘凉血”的动物么？

（六九年七月廿一日）

八

写了几则谈论周作人的《回想录》的短文之后，偶然在旧报章上发见一九四〇年初许广平写给郁达夫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她当时在上海设法接济鲁迅在北平家属生活的情形，正好揭穿了周作人所谓“系累太多”之类的鬼话。

周作人晚年常常写信给香港的一些没落文人，申辩他抗战时期所以留在北平，是因为要照顾鲁迅的母亲等人的生活。这个老汉奸有时还反咬别人一口，说什么“这些……辩解结果无非证明我意志薄弱，没有撇掉家族，牺牲别人，救出自己的努力而已”。他在《回想录》中所谓“系累太多”云云，也是这样的意思。实际上，从抗战前后以至沦陷初期，鲁迅在平家人的生活费，他是完全没有负担过的。到了后期，也差不多是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连许广平的去信也没有一字回复。且看许广平写给郁达夫的信：

“……北平方面；每月开销，鲁迅死后，我一直担负全

部到两年之久。实不获已，才去信二先生，请他负担。他并不回信，祇由老太太来字说他担任一半，其馀一半及意外开销还要我设法。想到她们的孤苦，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设法”。

当时郁达夫正在星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的《晨星》副刊，这信就登在该刊上面，其他各地的读者都未读到。就连许广平自己恐怕也不知道会有这么一段墨迹在星加坡的报章披露过。这就是周作人敢於扯谎骗人的原因。

（六九年七月廿八日）

九

许广平除了写给郁达夫的一封信外，还有一段关于周作人的文字，也值得在这里一述。那是关于《热风》一书是否有周氏文章在內的问题。

周作人三番四次声称鲁迅的杂文集《热风》混有他的文章。最初一次是鲁迅逝世後日本改造社编《大鲁迅全集》的时候。周氏当时提出抗议，说该社从《热风》中所选的几篇杂文是他写的。到了他晚年与香港投机文人通讯，还不断旧事重提，说这是求其实在，不是要争权利云云。香港的投机文人也大力帮腔，说鲁迅的散文有些是周作人的作品，那不是一般人所知道的。

其实，早在战後初期唐弢编印《鲁迅全集补遗》时，许广平已写了一篇读後记声明道：“（周作人）这抗议因为不在鲁迅先生生前出书时而在若干年後逝世了始听到，……倘更有张三李四，肯出来担当，不是鲁迅全集都可以取消了吗？……我的意思是鲁迅先生的全部著作，或有一二是别人执笔，

但是经过鲁迅先生自己编校，收在集子里，当时既未经作者的异议，以後我们就敢妄作主张。倘使是别人编校而有误行收入的，我们不反对读者的指正。譬如红楼梦考证，不是经过百数十年还有人做吗？”这段文字目前还可以在旧版书《鲁迅全集补遗》中见到。这里對於有关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照理这是应该就此告一段落了。然而老汉奸周作人仍旧是那么喋喋不休，还说不是在争权利，又拉了些投机文人来唱双簧，真是十足老奸巨滑的作为。

（六九年八月四日）

十

上星期谈到的许广平在《鲁迅全集补遗》书後写的一段关于周作人的文字，新版的《鲁迅全集》（注释本）中是没有收入的。这里又反映出了一个小问题。

鲁迅逝世以後，他的著作由别人彙集编印的，主要有四种。即许广平编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与《集外集拾遗》，唐弢编的《鲁迅全集补遗》与《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前两种因为编出较早，都收入旧版的《鲁迅全集》中。後两种是在《鲁迅全集》出版後才辑录的，所以作为全集的补编印行。这几种书都附有编辑後记之类，说明彙编的经过或一些有关问题。许广平的那篇鲁迅全集补遗读後记，就是针对周作人所谓鲁迅全集混杂有他的文章一事有所声明的。

然而，上述各书，在近年由周扬林默涵等人主持编印的新版的鲁迅全集中，除了《且介亭杂文末编》仍保留原来内容外，餘者都已面目全非。《集外集拾遗》的一些诗文被搬

入一九三五年出版的《集外集》之内；《鲁迅全集补遗》及《补遗续编》更被完全拆散，插入《集外集拾遗》里面，弄得乱七八糟。所有编後说明之类文字，包括许广平的鲁迅全集补遗读後记等等，就这样无影无踪了。这种作为，主要当然是为了抹煞许广平唐弢等人长期搜集鲁迅佚文的劳绩，间接却也为周作人提供了混淆视听的方便。因而目前的一般读者，只看到那个老汉奸在胡言乱语，却看不到许广平的有关声明。难怪美国人最近在香港抢购鲁迅全集，每部炒至星马币五百元。原来周扬们在这部书中大做手脚，正是美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最感兴趣的。

(六九年八月十一日)

悼范文澜

香港路透电报导，中国名史学家范文澜已於本年七月廿九日在北京逝世。

范氏是星马读书界最熟悉的现代中国史学工作者之一。原因除了范氏的历史著作，精审整练，较之周谷城以至翦伯赞、吕振羽诸人的作品更受重视之外，还因为他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论争中的一个主角。

稍为留心历史问题的读者都知道，近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因为西周社会的性质问题而分为两派，展开了长期而广泛的论争。主张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一派，以郭沫若为首；认为西周已经晋入封建制的一派，便是范文澜领头的。这两派的学说盛行於史学界，许多讲述中国古代史的人，都免不了由这两者择一而从，星马地区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这情形真有点像春秋战国时候的杨朱与墨翟，其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於杨，即归於墨”。范文澜之特别为人熟知，这自然是一个原因。

范氏的历史名著，就星马地区所见到的，有《修订本中

《中国通史简编》及《中国近代史》两种。这两部书似乎都没有写完；前者只出到隋唐五代，后者则只出了上册。范氏近年经常生病，卧床不起，其最晚出《中国通史》（修订本）隋唐部份，已有好些章节是别人协助起草的。看来他的未曾彙印的遗稿也不会太多了。名山事业，全功未竟，这不但是作者个人的遗憾，也是我们读者的一项损失。

（六九年八月十八日）

二

中国名史学家范文澜於最近逝世，报载北京的学术界曾为他举行了一个追悼会，但不知大家给予范氏的是怎样的一个评价。在这里，我们觉得范氏至少有两件事是值得—述的。

其一是他的苦学精神。范氏是浙江绍兴人，出身并非富有，但却勤奋耐劳，坚持唸完大学课程，是早年北大历史系一位出名的苦学生。毕业後赴东京留学，却因缴不起学费而中辍，只好在校外刻苦自修，每日以麵包及白开水充饥。经过了整整两年的苦读，终於完全吸收了当时日本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如河上肇等人的学术成果，成为他以後一生学问事业的基础。

其次是他的先进意识。范氏是以新的科学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人。他从一九二九年担任北大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席起，便开始运用新颖的学理来讲授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逐步揭示出来，在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中起了划时代的转捩作用。其後因为遭当权者所忌，诬陷他援助受难学生，以致入狱多年，备受折磨。结果虽获蔡元培等人

营救释出，却始终得不到一个安定的研究环境，迫得远走边陲，在西北一带各大学任教。直到战後好几年，才由张家口返回北京。近年来，许多历史工作者，包括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个个遭受时代淘汰了，范氏却一直屹立於时代前头，踏实工作，以至逝世前的一刻为止。这一点与他的一贯的先进精神显然是分不开的。

(六九年八月廿五日)



河崎丢官

日本驻阿根廷大使河崎一郎因所著《日本真相》一书惹了笔祸被免职之後，已於本月起出任三菱重工业公司的顾问。据说这个新职位还是炒了他的鲑鱼的爱知外相所推荐，并由许多达官显贵替他安排的。

《日本真相》一书因为对於日本人的体态以及日本的世界现象有所批评，引起佐藤政府大发雷霆，宣佈“河崎以代表日本国家的大使身份，不该对本国提出不适当的指责”，立刻飭令他引咎辞职。於是一般人都以为这位丢了官的大使，既然犯了众怒，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註定倒霉了。然而他竟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达官显贵们做好做歹，很快就给他安排了另一出路。这也许是大家所料想不到的吧。

其实，这事一点也不奇怪。河崎毕竟祇是违反了外交人员的常规吧了，他并非真的失去了达官显贵们的欢心。他写的书虽然对於日本人说了几句不敬的话，譬如批评一些政客对於国家利益认识不足，缺乏道义心，竞相攫夺权力，使用贿赂威胁手段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等等，实则这些都是皮相之

谈，丝毫也没有击中要害，有时反而起了一种烟幕作用，帮了佐藤政府一个大忙。例如，他写道：“令人不解的是，被褫夺军权的日本，并不认为中国也会和美国一样引起威胁，反而对中国的成长和威望表示景仰”。正当日本各地的学生群众运动，热潮汹涌，一致反对延续日美保安条约的时候，河崎这话在佐藤政府听来自然是很悦耳的。

(六九年九月八日)

二

日本前任驻阿根廷大使河崎一郎的《日本真相》一书，除了揭露了一点日本政界的黑幕之外，也嘲笑了日本人体态的如何不美观，以致被视为有辱国体，丢了乌纱帽。这事通过一些通讯社夸大渲染，曾经轰动一时，彷彿河崎的书真的是对於日本真相的大暴露。实则河崎的笔触完全没有涉及日本的真正醜恶的一面，反而处处尽其粉饰现实或转移视线的作用。在谈论政治时是如此，在对於日本人体态发挥其审美观点时也没有例外。

河崎写道：“日本人在所有人种中，肉体上是最缺乏魅力的；甚至黑人的皮肤颜色，至少也比日本人更具性感……。日本人的面部像是蒙古族那样，脸呈扁平，颧骨突出，头颅的样子难看，胴体过长，两腿短而时呈弯曲”。这话自然不免引起一般日本人的不满，但如果因此而把读者们引导到这一类无关痛痒的问题上来争执，漠视了许多真正应该批评揭露的现象，诸如东京靖国神社的隆重追悼“战歿英灵”；神风自杀队员的重聚一堂，宣扬当年的赫赫战果；文武百官都

在处心积虑，希望接替美国现时在亚洲的地位，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等等，那正是佐藤政府所喜闻乐见的。爱知揆一这些人对于这一点当然十分清楚，所以河崎丢官不久，又在日本的上流社会中东山再起了。何况河崎在指摘自己的同胞的体态的同时，也对黑人及蒙古人诋毁了一番，表示有色种人多是醜恶难看，不独日本人为然，这也足够平息一般日本读者的气愤了。

(六九年九月十五日)



鲁迅纪念晚会

前天晚上看了星加坡表演艺术学院“鲁迅纪念晚会”的演出，我联想起好久以前参观过的另一个鲁迅纪念晚会。

时间是一九四七年秋。记得是由“星华文艺协会”主办，假大世界遊艺场的一个戏台公开举行，除了本地的若干文娱团体参加表演外，当时正在星马各地巡迴献艺的“中国艺术歌舞剧社”也有人登台客串。详细的节目已经淡忘了，印象较深的是高尔基的《海燕》的朗诵和一个关于渔家生活的独幕舞剧。那是一个热烘烘的夜晚，观众多，气氛轻松，会场上不时浮现愉快的笑声。

星加坡表演艺术学院这一次的晚会，则又是另外的一种情调。比较起来，演出的安排是更为认真一点，所有节目如独幕剧《阿Q的悲剧》，诗歌造型《向鲁迅学习》，以及小说朗诵《药》等，都是专为这个晚会而创作或排练的；舞台的灯光设计等技术显然也提高了不少。此外如鲁迅的作品以及有关鲁迅研究的书刊的展览，也是别出心裁的一个项目。然而由于举行的地点已由广场退到室内，由大戏台退到小庭院，因而已经没有昔时那种开阔的气象，热烈的场面，却增

添了几分肃穆沉重的情绪。这些自然是时代环境不同了缘故。

可喜的是，尽管不同的时代环境产生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晚会，当地艺术工作者的坚持纪念鲁迅，学习鲁迅，以及从事健康艺术表演的刻苦精神，看来却还是先後承续，始终一贯的。

（六九年九月廿九日）



胡志明的汉诗

北越通讯社最近发表了已故胡志明主席的一批汉诗，泛亚社由东京转录了其中数首，写成新闻，并加评语云：“其汉诗文字并不优美，但颇有含意和略为押韵”。

从传统的欣赏汉诗的眼光来看，胡志明的诗作确是不够“优美”的，他的文字粗犷浅露，还有点生硬拗口，缺少一般汉诗读者所爱好的“清新俊逸”之气。表面看来，这似乎是由於作者对於汉文的特征以及汉诗的形式，掌握运用不大熟稔的缘故。其实不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於诗的内容。胡氏一生从事革命，备尝艰危，特别是在早期，所过的都是极其紧张惊险的生活，所见的也多是监狱，血污，以及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人民的种种苦难境遇。这些经历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去，就成了一种新的境界，新的诗型；诸如一九三二——三三年所作的《狱中日记》题诗：“身体在狱中，精神在狱外，欲成大事业，精神更要大”。这些诗作，对於读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类汉诗的人来说，自然是要感到格格不入的。

但胡氏也有一部份作品，是符合传统诗评家的审美观点

的。这原因也同样是由於内容的关系，因为那是他後期深居山间，过着游击生活时的写照；例如一九四八年所写的《秋夜》：“筹划更深渐得闲，秋风秋雨报秋寒，忽闻秋笛山前响，游击归来酒未残”。这里，有“山”，有“酒”，有“秋笛”，有“秋风秋雨”，时间又是更深夜寒，在境界上有点接近於中国古代的田园诗或边塞诗，一般人读了也许就会觉得不失为“优美”之作了。

(六九年十月十三日)



再谈苏联

苏联驻马使馆发表了一段新闻简报，说马来西亚的一套纪录短片《女农民》以及锡兰的一部描写农民开荒的电影参加苏联本届国际电影节演出，在苏联观众中引起了特别的反应。“对他们来说，这是亲近和密切的。因为较年长的犹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後，他们开始开垦自己的土地和当时的困难。”

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後”，乍看时真有点令人愕然，不知道这一番大战之後對於苏联究竟有何划时代的影响。但接着也就想通了，原来指的是“十月革命後”。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作为“十月革命”的代称，这在我们还是首次见到的。

十月革命是苏联的开国纪念，它和美国的独立战争，中国的辛亥革命等等，同样是正正堂堂的光辉史迹，不但苏联本国以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提到它的时候常常带着自豪的感情，就是西方国家也都一致接受这个既成的事实；而现在苏联的外交人员却把它当作一项忌讳，代之以“第一

次世界大战”，这实在是太值得玩味了。

近时，坊间出现了好几种《今日苏联》一类的书，叙述修正主义推行下的苏联国内情况；报章杂志也译载了不少同类的报导。但这些文字所揭露的大都侧重于政治的或经济的事件，如官场的贪污舞弊，生产部门的资本主义化等等；对于文化思想方面的现象，似乎较少触及。如果有人要来搜罗这一方面的材料，像这样有意的讳言十月革命，倒不失为一项典型的事例。

(六九年九月廿二日)

二

莫斯科美联电称：苏共又在重修党史，重点是在恢复史太林的一些光荣事迹，并删去对于史太林的若干贬辞，如指责史太林自一九〇九年起便开始犯错误，致使苏共与苏联人民“面对严重的后果”等等。

如果说，克鲁雪夫时期的修改党史，贬斥史太林，是苏联推行修正主义的一项力作，那么，目前苏联领导层的重修党史，恢复史太林的一些荣誉，则可说是修正主义的再修正。为什么要来这一番再修正呢？主要的自然是企图挽回人心。因为近年来苏联在世界的社会主义集团中威信扫地，众叛亲离，早已失去前时的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国内也出现了大批被称为“史太林主义者”的反对派，直接威胁到目前的领导层的统治。许多论者都认为这种现象是史太林的道路与克鲁雪夫的道路的分歧，这分歧又正是从克鲁雪夫的贬斥史太林开始的。现在苏联领导层的重修党史，改变一点对于史太林

的评价，显然是想表示他们与克鲁雪夫毕竟有所不同，希望因此缓和国内外的不满情绪。

然而，这一番心血看来终不免是白费的。时至今日，苏联所面对的问题已经牵涉到整个的国策，包括外交，内政，经济，文化种种措施。譬如藉口“国际分工”而对於东欧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藉口“捍卫社会主义的成果”而对於捷克肆其军事侵略等等，都是造成它在共产国际中日益孤立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国内的实行“新经济体制”，宣扬“有了钞票就有了一切”的思想，引致贪污舞弊的盛行，新贵族阶级的出现，人民生活的困难，色情文化的泛滥等等，也成了反对派指责声讨的对象。在这种情形之下，对於史太林评价的书面修正，反而成了非常枝节的问题了。

(六九年十一月三日)

史太林爱女的新书

报载：两年前逃离苏联，托庇美国的史太林爱女史维拉娜，最近出版了她的第二部书《仅仅一年》，书中提到的关于史太林的事迹，比起她抵美后出版的一部书《给一位朋友的二十封信》来，观点有了出人意外的改变。在史维拉娜的第一部书里面，史太林是“一个言行谦恭，从不自夸且坦率的人”，他“那超人的人性本质，深得随从的爱戴和崇敬”。但到了这新出版的一部，作者却对其父大事抨击，形容他为一个“道德与精神的残暴者”，手创一个“充满阴谋，捏造，歪曲事实，暗中下毒和谋杀的人间地狱”。据说，史维拉娜所以有此新观点，原因是受了苏联作家里昂杜洛斯基所著的《史太林传》的影响。

与其说史维拉娜的痛骂史太林是受了别人的著作的影响，毋宁说是受了一般美国读者的口味的影响来得真实。那些读者，亟需一些内容“不平凡”的出版物或电影电视来填补精神的空虚。他们所欣赏的如果不是人猿泰山，占士邦，飞天大侠这一类紧张刺激，离奇古怪的故事；就是什么“妖后”，“艳尼”等等香艳肉感，大胆暴露的描写；再不然便是所谓

铁幕内的“骇人听闻”的报导。把一个作为“铁幕国家”的政治领袖的史太林写得比较正常，这班读者是难免觉得不够瘾的。必须加些“暴虐残忍”的渲染，看来新奇有趣，才能多销几本；将来拍成电影，也能够像《暴君焚城记》那么风行，可以多抽一点版税，维持“寓公”生活。所以虽然父女情深，无奈纽约麵包太贵，也就顾不了许多了。

（六九年十月廿日）



關於乔冠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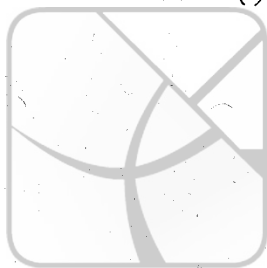
中苏边境谈判连日在北京举行，路透社有一则电讯在报导双方代表团团长的略历，其中提到中国代表团长乔冠华的一段，對於星马方面的读者，似乎是愈说愈显得陌生。其实这个人物正是星马的读者所熟悉的；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在香港大量撰写军事评论，风靡一时的乔木。（或称南乔木，以别於一向居於北方的胡乔木）

那是中国抗战中期，日本即将南进的时候，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和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等都在香港出版，乔木的军事评论就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他的作品议论透闢，文笔生动，使一般读者看了不但對於当时盟国的反侵略战争的局势有了明晰的了解以及坚强的信心，而且有如欣赏了一篇优美的文艺创作那么愉快；加上茅盾诸人的文学名著如《腐蚀》等同一时候也在这些杂志上连载，所以每一期的刊物一由香港运到，便立刻成了星马的青年学生普遍抢购的对象。本地读者的熟悉乔木，就是这么的一个由来。到了战後，乔木做了香港新华社的主任，多办行政，少写文章，乃逐渐与星马的读者疏隔。再後來，乔木离港北返，偏向外交

活动，读者们的印象也就更加淡薄了。

近年来，当地大多数读者所能接触到的香港刊物，再也不是乔木等人在谈兵论政，生气蓬勃的《大众生活》之类，而是另一类内容相反，专以失意政客的自传或回忆录为号召的杂志。这使人不禁有人世沧桑之感。时间不过二三十年，然而昔时在写文章的人已改行做“官”，昔时做官的人却被摔下来写回忆录，这变化也真不小了。

（六九年十月廿七日）



真正的闹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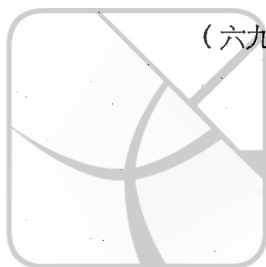
美国的一个保护动物的团体“人道协会”，最近指责华盛顿国防部使用“间谍鸽”以代替U二型等侦察机的计划，称为“残酷，怪诞，及无稽的闹剧——我们时代极端愚蠢的计划”。据说，国防部已与密西西比大学签订一份六十万元的合同，由该大学进行一项为期三年的实验，研究利用鸽子及兀鹰，乌鸦，鸚鵡等鸟类担任空中摄影，侦察地雷，及替大砲与飞弹寻找目标等特殊任务。

按“闹剧”原是戏剧的一种型式，指的是一种以悲剧开场而以喜剧收场的剧作。因为这种剧作既非悲剧也非喜剧，所以戏剧家另外给它定下这么一个名称。但目前的一般所谓“闹剧”，却与原义迥不相侔，而祇是取其字面的意思，专指一些怪诞，胡闹，或愚蠢的作为。然而美国人道协会的指责使用间谍鸽的计划为“闹剧”，即使按照这个字眼的约定俗成的意义来看，也不一定是恰当的。这计划虽然有些怪诞，却不见得愚蠢。美国连年征战，不但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就是那些天天在别人的国土上空飞行的无人驾驶的侦察机，也被击落了不少，结果弄得山穷水尽，民怨沸腾。国防部目

前正在大动脑筋，希望可以不必耗费自己的人力物力而坐收战争的实效。譬如建立什么安全体系，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之类。假如几毛钱一隻的鸽子果能取代数百万元一架的侦察机，那正是合算不过的。最好能进一步研究出如何使用鸽子来代替活人上阵打仗，那么战争的成本就无比廉宜了。

显然，真正在上演所谓闹剧的，倒不是美国国防部，而是这个人道协会——当广大的美国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参加反战示威行动的时候，它却在为几隻鸽子请命呢！

(六九年十一月十日)



游行的型式

美国数十万群众由上週四起展开了一连三天的全国性反越战示威遊行。事前，反战人士曾因遊行路线问题与当局争执了一星期之久。示威者本来打算包围白宫，华盛顿当局则以遊行将发生暴力事件为理由，一直拒绝发给准字。结果双方互相让步，同意遊行队伍由国会两院大厦起程，经过宾西德尼亚大街（距白宫一条街道），前往华盛顿纪念碑。遊行主持人同时矢言：示威过程中将不会有暴力行为。

美国的确不失为一个大牌的民主国家，它的人民固然有所谓集会结社的自由，而政府当局也拥有拒绝发给准字的自由。於是示威遊行之前必须来一番谈判，而官民双方也谦恭礼让，终於达致折衷的安排。与这情形迥异其趣的是日本。日本全国民众为了要求收回冲绳，废除日美安全条约，抗议佐藤首相访美，也同样自上週四开始其一连数天的示威行动，然而却完全没有所谓准字与路线问题的谈判这一套。甚至“不宣而战”，劈头就来个四百万人的大罢工，引致全国交通瘫痪，警方手忙脚乱。接着就是进步学生在东京各地展开“游击活动”，银座的地下电车及商店被抛掷燃烧瓶，一时火

光冲天，黑烟瀰漫。冲绳也发生示威群众企图闯进美军基地，而与美国卫兵及琉球镇暴警察流血衝突的事件。据说，本月十六及十七日是大示威的最高潮，局势将更紧张，政府已动员了七万名警员，在全国各地严密戒备。

看来，这一类反战示威遊行，形式上似乎也可以“一分为二”。一种是循规蹈矩的美国式，另一种是捉摸不定的日本式。

(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英王室喊穷

英女王夫婿菲立浦亲王最近向美国电视台访员发表谈话，透露有关皇室经济拮据的情形。据说，伊丽莎白女王的薪俸十八年来一直没有增加，每年都是四十七万五千英镑，但是通货不断膨胀，百物腾贵，日常各项开支非常浩大，原来的数目已经不敷应用，因此女王或需迁出排场阔绰的白金汉宫，搬到规模较小的地方去住。

这一段访谈在报章上发表以后，英国举国议论纷纷，反响不一。有些人同情皇室的财政困难，要求国会增加女王的薪俸；许多退休的公务员以至“普通的老百姓”甚至发动捐款来奉敬女王。英国首相威尔逊也迫得允诺就女王年俸问题提出检讨；虽然这主要是为了拉拢选民，应付明春大选，真正要继续维持皇室那种豪奢阔绰的排场恐怕是力不从心的，但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反应。另外一些人，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们指责菲立浦亲王不该向外国诉苦，致使英国家醜外扬。

其实，英国的穷相毕露，捉襟见肘，早已没有什么秘密

可言，菲立浦亲王的诉苦，并不见得怎样丢了英国人的脸。如果说王夫此举显得有点不识时务，那倒是实在的。随着这个日不落国的沉落，英政府正处处采取相应措施，要人民束紧腰带，照理皇室的日常生活也该改弦易辙，另作一番安排，不应始终留恋它的豪华旧梦才是。目前连英国的数万大军都在打叠包袱，准备撤出远东，把这地区的大好霸业拱手让给别人，则英女王的迁出白金汉宫，稍为纡尊降贵一点，又算得什么呢？

(六九年十一月廿四日)

二

英国王室的喊穷引起了国内的一系列批评，其中态度最为苛刻的，倒还不是责难菲立浦亲王不该去向外国人诉苦，而是暗示王室的存在不过是纳税人的多馀的负担，如工党副主席汉米尔顿的谈话：“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纳税人为了供养王室而负起任何新的担子”；或者主张取消现有的对於王室的某些优待，如另一位工党议员英吉利斯的“要求政府取消有关豁免女王缴纳所得税的立法条例。”

这可以说是代表了英国一般新贵族的更为现实的观点。英国的资产阶级自十七世纪末期完成其所谓“光荣的革命”，建立了国会民主政制之後，王室虽然大权旁落，需要人们“供养”，实际上却也没有白拿薪俸，英王或英女王二三百年来对於那些政权在握的绅士们倒是帮了不少的忙，在大英帝国的扩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最显而易见的一点便是作为英联邦的团结的象征与效忠的偶像。许多殖民地的

顺民，譬如以前星马地区的峇峇，尽管对於世事一无所知，但一谈到什么“皇家”，什么“爱德华×世”，“乔治×世”，就无不滚瓜烂熟；那首“天佑吾王”，“天佑吾后”的歌曲，也唱得十分婉转有致。可见王室的每年数十万镑薪俸，并不是无功受禄的。只是最近若干年来，由於殖民地人民的普遍觉醒，搞起了民族运动；英联邦也已显得四分五裂，名存实亡，这么一个团结效忠的标帜，才真的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品。於是那些算盘愈打愈精的新贵族，自不免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负累，“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来“供养”了。

(六九年十二月一日)

美莱村事件

美国兵在松美地区美莱村屠杀南越平民的暴行，掩盖了二十个月之後，終於被揭发出来，於是舆论哗然，纷起抨击。纽约《生活杂志》更以十个版面的篇幅来刊登现场图片及士兵平民会见记，详细报导事件的始末。

在这篇题为《无可争辩的恐怖故事》的报导及其插图中，有两个场面非常动人，都是一个叫做哈贝尔的陆军军曹所揭露的。

第一个场面是一名男孩子，他的手腿都中弹受伤，却还是咬紧牙根不响。哈贝尔描写道：“一个小孩向我们跑来，他的手足都已中弹，但他没有哭，一声不响。……一个士兵向该小孩连开三枪，第一枪击中该小孩的背部，第二枪把他抛上空中，第三枪把他击落。该小孩腹破肠流，那士兵若无其事地走开”。

另一个场面也是关于儿童惨遭杀害的情景。那是一幅照片，显示两名小孩均被枪击，其中一名尚未断气，躺在稻田中的一条泥泞小路上。哈贝尔为他所摄的这幅照片写说明称

：“当这两个小孩受枪击时，较大的孩子伏在小的身上，似乎是在保护他。后来，那些军人把他们双双打死”。

这两幅照片本质地反映了目前越南战争的精神面貌。越战的一方自知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也无胆量从战场上找敌人拼命，於是靠屠杀平民泄愤，以满足他们的疯狂。而另一方面，南越的人民却被战火锻炼得日益壮健，连他们的幼小的一代也是那么倔强无畏；有的在被杀戮的时候始终咬紧牙根，鄙视敌人，哼也不哼一声；更有的毫无犹豫地捨却生命，去保护更加幼小的同伴。他们显然知道：有了幼小者才有民族的前途。

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可不是够明显了么？

（六九年十二月八日）

二

南越美莱村的屠杀案被揭露了之後，华盛顿当局所采取的对策是尽量把事件孤立起来，使美军的屠杀平民被视为偶然现象，是一小撮暴戾成性的士兵的“违悖良知”，并非当局所鼓励的普遍的暴行；同时也想藉此宣扬一番美国的“民主政制”与“公正审讯”，於是有了军事法庭提控卡利中尉以及准许报章电台报导惨案详情的决定。接着又有尼逊总统的电视广播，在“谴责”屠杀行动之後，就特别强调这是“单独事件”。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与这所谓“单独事件”愈来愈不合拍。许多同类的暴行接二连三被揭发出来了。其中包括了美军在广义省的另一次大屠杀，“把南越平民当作枪靶子那样射击”，

“稻田里至少躺了一百具越南人的尸体——他们把妇女强姦後一样打死”；也包括了美军对於战俘的种种酷刑，诸如把战俘从直升机上推落地面，或者吊在直升机底下，飞过树顶，使之碎屍等等。一些逃兵披露：这种种酷刑是在美国先训练好的；军部的典型训令是每名在南越的美国顾问之类每月须“维持杀死五十名越共的数额”。有些熟悉越战情况的人更表示：这一类暴行连年来已经司空见惯，不成为新闻了。加拿大妇女之声会会长古尔汉夫人就指出：没有人不知道，南越的美军都在比赛杀人，誇耀暴行，多杀一名孕妇就多得分。

我看，尼逊总统如果仍想证明美国人还有所谓“良知”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就不是再提出什么“单独事件”，而是接受越共的挑战，举行“新的纽伦堡审讯。”

（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三

美国的若干反战官兵最近指证了多宗驻越美军残酷杀害越共战俘的事件。但不知道是有意无意地隐藏了一些东西，抑是经过通讯社的一番剪裁取舍，这些指证的内容看来还有不少不尽不实的地方。它们似乎企图给予读者一个印象：美国兵固然是暴虐无比，许多被俘的越共却也是贪生怕死，抵受不了美军的严刑迫供。

一名飞机师暴出了一幅一个越共战俘被推落直升机的照片，这幅照片的说明是：“此人是和另两人在圆地洞内被捕的，……地面人员把他们三人押上我们的指挥机内以便诘问。

此人不肯说话，所以被推下机。他被推下机後，其他两人则不停地说话，因此我们获得许多宝贵的情报”。

又一名尉官供证称：美国兵向受伤流血而被俘的越共套取情报，答应在他透露情报後把他医治。但“越共俘虏透露情报後即被置於村中，让他流血而死”，如果流血而不死，则“最後用一把生锈的刺刀把他刺死”。

一个战俘被推落直升机，另外两个便“不停地”说出“许多宝贵的情报”；受伤的越共为了要敌人“把他医治”，也以“透露情报”作为交换条件；这在一般“人性论”者看来，应该是非常真实的。但恐怕也有许多读者要表示怀疑，像越共这么一支配备简陋的军队，如果他们的成员竟是这样的懦弱怕死，那么他们憑什么来和数十万坚甲利兵的侵入者週旋了这许多年，而且愈来愈坚强壮大呢？

（六九年十二月廿二日）

四

莫斯科合众电报导：苏联诗人叶杜申科在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真理报上发表一首诗，把美国骂做屠杀南越美莱村村民的刽子手。

一首诗的发表竟然值得这么特别拍电报导，照说那应该是什么驚人的精采之作了。从通讯社记者写的那段新闻头看来，大家也会认为诗人的笔下對於美莱村的屠杀案一定是倾泻出满腔不同凡响的激情来。可是，当你接触到诗的内容之後，你却不免感到大大的失望。原来整首诗里面就只有“你们那些烧毁村莊的刽子手”一句还像话些，也是唯一可供通

讯社的记者大做文章的所在，其余的诗行如什么“你们美国把自己着实打扮，身上披上一袭白袍，在胸襟上又插上了一朵花，可是你们却突然给骷髅绊倒”，什么“你们必须放文雅一点，不要把你们的宾客吓坏，因为你们的长统靴满粘着儿童的头髮”等等，却尽是一些装腔做势的文字游戏。至於什么“戒掉把你们的脚放下桌上的习惯”之类，可就更加高深奥妙，不知所云了。

关注美莱村一类事件的读者，与其欣赏这首谜样的诗作，倒不如读读美国军曹威斯氏的一段谈话。他在法国左翼作家沙特里所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揭露说：“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六月间在西宁省约翰逊行动中，美军奉令，勿对军民加以区别。……我们被告知，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平民的，每个人都是敌人，我们不要管他们的年龄和性别。……事实上，我们杀人像射杀鸽子一般”。同样是指控屠杀南越平民的刽子手，这一段话比起苏联真理报的诗篇来，不是更加精练与更有本质意义么？

（六九年十二月廿九日）

五

上星期说过，苏联诗人叶杜申科最近的一首作品，所谓把美国骂做屠杀南越美莱村村民的刽子手，只不过是诗中的一句而已，其他的诗行便都在玩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还不如一个美国军曹的一段谈话来得更有内容。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既然诗的内容并不见佳，何以合众社的记者要特别从莫斯科拍出电报来呢？

其实这道理倒很简单。通讯社的记者所着重的并不是诗的内容，而是诗人本人。读过一点《今日苏联》之类文字的人都知道，这位叶杜申科，乃是近年来苏联最著名的一个青年诗人，今年才二十四五岁，却已有不少作品在国内外发表，且时常被派往欧美各国访问，为欧美各国的上层人士所熟知。他所获得的评价实际并不太好，法国人把他列为“新潮派”，日本人说他是“太阳族”的诗人（阿飞诗人），美国《生活》杂志则称之为“苏联最有成就的反成就的诗人”。然而还是有不少人赞赏他，欢迎他，出高价购买他的作品的版权。因为他的诗篇的思想意识恰好适合这些人的口味。他有一首名作，题目叫做《布拉茨克水电厂》，内容是反史太林的。另一方面又有大批新式的“情诗”，描写些什么“她身上有多少性感”，“快让我吻吻”，“彼此亲热的拥抱”，“脱光了衣服的软弱的女人”……。此外，他和美国人也很好，一九六六年他访问美国期间，美国的一些名流就为他举办了一系列的诗歌朗诵晚会，他也到过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坟前去献花誌哀。这么一位兼充和平大使的阿飞诗人，他的近况自然是深受关注的。这就是为什么合众社的记者要特别报导他的新作品的原因。

（七〇年一月五日）

“正义”的遗漏

报章上一则花边新闻说：今年是联合国成立廿五週年，一个筹备会议通过在纪念章和邮票上印上“和平、正义、进步”的字样，结果纪念章和邮票印了出来，却只有“和平、进步”二字，漏了“正义”一个字眼。沙地阿拉伯的代表坚持应当重印一次，加上“正义”字样。这提议终於获得联大通过，但联合国却因此需要多花费七十五万美元的印刷费，平均一个英文字母是十万零七千美元。据秘书长宇丹解释，这错误是秘书处的一个职员铸成的。

秘书处的职员有了这错误也是奇怪的。这种情形恰好反映了今天一般人，特别是一般坐在办公室里的饭碗主义者的思想意识——他们最多只有“和平”与“进步”的愿望，完全没有所谓“正义”的观念。

“和平，正义，进步”这几个字眼，其中最深入人心的一个是和平。因为“和平”有时就等於“苟安”，正合乎大家所熟谙的“宁作太平犬，莫作乱世人”的活命哲学。其次是进步。这也是一个相当笼统的概念。个人的升官发财，社

会的浮面繁华，都可以解释为一种“进步”。所以这个字眼也是容易被接受的。至於“正义”，那可就与“非正义”界线分明，讲究起来麻烦多多，以致一般聪明的人们都尽量避免触及这个问题，久而久之，也就随波逐流，有奶便是娘，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忘记世间应该有“正义”这东西了。这么看来，联合国秘书处人员在印纪念章和邮票的时候把“正义”一字遗漏了，倒是其来有自的。

(七〇年一月十二日)

二

联合国廿五週年纪念邮票的印刷，因为秘书处一项手续的错误，以致漏了“正义”一字。我们曾说这情形正好是世俗社会的缺乏正义感的反映。这里应该补充一句：它同时也是联合国本身的缺乏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的反映。

联合国一向总是避免谈到正义问题的。譬如最近一次的联大的情形，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联大未经表决就决定将有关中东危机的辩论延至下届会议举行，原因是各国代表团都认为“当四强正为一项多边谈判寻求解决方案之际，公开辩论中东危机将於和平事业无助”。这就等於承认强权就是公理；明辨是非，伸张正义，都是多馀的。

更有趣的是联大主席布洛克小姐的表演。她在会议宣告闭幕之际，呼吁各国“设法解决当前的一些最大难题——越战，中东危机及尼日利亚的内战”。怎样解决呢？那就是：“直接有关之各造应立即停火”。

越南等地的战争根本就是正义与非正义之争，布洛克小

姐因为“食君之禄”，不敢碰及问题中心，所以只能笼统地提出“有关之各造应立即停火”。她自己也知道这样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於是有了“我们的成就着实渺小得很”的感喟。

既然联合国与正义这东西是如此的疏远，它的秘书处的人员在印刷纪念邮票的时候遗漏了“正义”倒是正常的；如果“正义”不被遗漏，那反而是奇怪了。

(七〇年一月十九日)



富翁与战俘

(一)

美国德萨斯州的亿万富翁贝洛氏，上月在永珍与北越大使馆官员会谈，建议北越释放美国战俘以交换重建被美国炸毁的学校、医院，及其他建筑物，但为对方所拒绝。这位卅九岁的达拉斯电脑巨擘对於北越的态度似乎有点不解，他举行记者招待会说：北越断然拒绝，正如拒绝他包租两架喷射客机运载圣诞礼物到河内供给战俘一样。

原来在这以前，贝洛氏已经有过一次建议被拒绝。他请求北越准许他用两架包租飞机载送圣诞礼物赴河内，北越则坚持圣诞送礼必须遵守早经规定的条件，即沿着平常邮寄路线，经莫斯科抵达河内，每个战俘所收到的礼物不超过三公斤，包括明信片，医药品，个人用品，以及不易坏的食品等。北越政府强调，即使圣诞无人送礼，每个美国战俘也将受到北越人道政策的款待，准其依照美国风俗庆祝节日，参加弥撒。他们将获得一株圣诞树，而且在圣诞晚餐的菜单内加入火鸡。

包租飞机送礼已然被挡驾，还要提出释放战俘问题，那

是只能怪贝洛氏要自讨没趣了。如果重建学校医院就可以交换到战俘的释放，则美国今後更可肆无忌惮的出动飞机去滥炸别人的国土，而且大可贴近地面瞄准目标来投弹放火，再也不必担心那些机师被人击落，成为战俘，甚至连无人驾驶的飞机也不必使用了。因为只要多炸毁几间学校医院，就有了足够的条件，可以靠重建这些建筑物来把机师赎回来，让他们再次以至无数次地肆其暴行，这倒是便宜不过的。

(七〇年一月廿六日)

二

(一)

那位建议北越释放战俘以交换重建被炸毁了的学校和医院的美国亿万富翁贝洛氏，据说是一个叫做“我们站在同一条线上”的机构的主席。我们不知道他究竟跟谁站在同一条线上，但有一点却是很明显的：他与北越人士却是完全屬於两条线上的人物，这从双方對於美国战俘的不同看法上便可见出。

北越认为那些在它的境内被俘的美国机师实际上并非俘虏，而是屬於“犯了违反人道严重罪行”的战犯。因为他们“在越南进行侵略战争”，“轰炸扫射和杀害许多平民，消灭了许多北越的市镇和乡村”。所以他们应受北越的司法权的约束，不能享有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协定有关对待战俘规定的利益。

但贝洛氏却似乎认为那些战俘只是被擒了的人质，可以用金钱赎回来的，所以他建议释放战俘以交换修建医院学校。这是商业社会的典型的思想意识。在商业社会中，一切东西，

包括爱情，自由，生命，人格等等，都被认为可以金钱来衡量，交换，代替，或赔偿。法庭上的许多犯人可以罚款来代替坐监；婚姻破裂了，人格受损了都可要求物质的补偿；人寿保险意外保险等等其实并非真的保证你的健康和安，而是指一旦死了或受伤了可以得到一笔款项。在这种社会中浸染久了，特别是一些身为大老板如贝洛氏之流者，自然就易於形成一种“钱能通神”的观念，以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尊严，也大可以用金钱来交换或收买了。



(七〇年二月二日)

后 记

大约由一九六七年杪开始，每星期在报端写一则短文，议论些社会现象，差不多成了一项固定的工作。我的兴趣本来只在於辑录文艺史料，不喜发议论，也不善於议论；加以约束在一小圈花边之内，思路窄小，着笔为难，因而每届交稿之日，常常苦於无话可说。可是为了职务关系，又不得不勉强挤几句出来。这样，积少成多，几年间倒也凑集了十馀万字的剪报。但我对着这一批患了先天的严重的贫血症的“成绩”，并没有感到愉快，所以从未重看一遍。这次如果不是出版社来索稿印书，大概还是让它继续搁着的。

现在整理出来的是一九六七年底至七〇年初所写的数十篇，约六万字。

文章发表时没有标题，这里的题目是新加上的。为了省事，一些题材相同者尽可能连接起来，合用一个篇名。但实际上每一则文字成稿时间不同，内容也无必然的联系，因此仍用“一”“二”“三”“四”之类小题加以隔开，稿末也照例附誌写作日期。

因为一向以编报为职业，早已过着“惯於长夜”的生活，近年以来，积习愈深，几乎把读书写作的时间都放在晚上下班以後，就连这本小书也是在长夜漫漫中编成的，於是定名《长夜集》。这完全是个人生活的写实，非敢比拟於前辈作者的月下觅侍，坚韧战斗。

方 修

一九七二年十月九日



